

南朝鲜人民的志向

2 028 4424 4

南朝鲜人民的志向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5

目　录

南朝鲜现状……………………………………郑敬谟(1)

韩国民众的志向………………………………郑敬谟(12)

泥泞之路 ………………………………………T・K(34)

可悲的证言 ……………………………………T・K(65)

抒情诗的时代 …………………………………T・K(96)

南 朝 鲜 现 状

郑 敬 谟

一、韩国有过解放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日本的统治告终的时候，韩国人曾陶醉于“解放”的喜悦之中，以为自己成了自由的人民。从那时起已经流逝了将近三十年岁月的今天，韩国人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荒原。

朝鲜总督府可能被消灭了。然而，“韩国总督府”却越来越显示自己的存在。

在迎接真正的解放之前，韩国人应当同自己本身展开什么样的搏斗，从什么状态中摆脱出来呢？

二、韩国是什么样的社会？

“正确的价值观”

闵宽植这个败类，是得了朴正熙政权的文教部长官的高级官衔的人物。他在访日旅行中，今年四月十二日访问了东京的韩国学校，在校务理事会上， 作了一场离奇古怪

的演说。他说什么韩国妇女为了获取经济建设必不可缺的外汇，在国内外作出“献身”的努力，对此，作为文教部长官表示满意。他还极力赞扬说，特别是“韩国的妓女、女招待大批渡日，为国家出卖××日夜奋斗，其爱国至诚实为可嘉。”缺字的部分是连流氓在私谈中也难说得出口的话（韩国语）。然而闵宽植文教部长官却因这个使人难以相信的插曲，在旅日韩国人中间成了超级名人。

“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朴正熙总统喜欢说的话，他一有机会就反复说这句话。负有向国民宣传朴正熙政权所吹捧的“正确的价值观”的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文教部长官。真没想到，我们通过闵文教部长官的嘴，得到了“正确的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具体解答。

加上，这些为了“卖××”而被派往日本的韩国妇女，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名为“艺术使节团”的护照，而把证明她们确实是“艺术家”的证明书发给她们的正是闵宽植长官负责的文教部。

据最近一期的《时代》报道，持有韩国政府颁发的“允许在客人卧室安慰外国观光客”许可证的卖淫妇，仅在汉城就有一千五百人。韩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烟花巷。据说，通过这些卖淫妇得到的观光收入，一九七三年就将近一亿两千万美元。对于因国际收支的赤字伤透脑筋的韩国政府来说，卖淫业是必不可少的。上面的报道刊登在五月三十一日的《韩国日报》上，说是“全文翻译”。但是原文中说这种卖淫观光“得到朴正熙总统在内的韩国政府高级

官员的积极鼓励”这一段却被删掉了。这可能是因为用文字说出自己的总统是买卖卖淫妇的人贩子，未免太不好意思了吧！

大大欢迎公害

韩国妇女的肉体成了日本人排出生理排泄物的处所，同时，韩国的江河和海洋也正在急剧地变成日本企业处理废液的臭水坑。韩国的领土仅仅是十万平方公里，住着三千二百万人口。同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有一亿人口的日本相比，韩国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条件可以忍受公害。韩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三位，日本是第四位。可见，公害容纳能力韩国倒比日本低。尽管如此，韩国政府却费尽心机地引进日本公害产业。

朴总统甚至指示“不必为公害神经过敏”。于是，石油、汽车、冶炼、电子、纤维以及娱乐业和旅馆业等各行各业的日本公害产业，认为这是大好时机，以一齐冲锋之势开始在韩国登陆。

今年头四个月，外国人对韩国的投资中，日本资本占百分之九十九。日本在绝对额方面也远远超过了美国。

目前，指控那些企图在韩国登陆的日本企业家抱有从经济上、军事上控制韩国的野心，也许是过分的。

在日本，找不到地皮，公害容纳限度也已超过，而且工资又高。因此，就算在韩国寻找其解决办法吧。然而，韩国政府却甘冒公害引进日本企业，其居心何在呢？朴政权是

不是把日本资本在韩国的“存在”当作维护权力所需的军事保证呢？朴总统在勉励为了把“通用马达”财阀引进韩国正在搞交涉的官僚的训话中说：“如美国大财阀进行巨额投资，就有和一个步兵师驻扎韩国一样的效果。”请读者把“美国大财阀”改为“日本资本”，“一个步兵师”改为“自卫队”后，再读一遍吧。

“没有日本的援助，就要垮台”

“联合国接纳中国，就将落为乡村信用组合一类的机构了。”因放这句厥词而被革职的是防卫厅长官西村。正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扬言：“为了救灾，自卫队可以向海外出兵。”“那么说，当东京受地震灾害时，日本打算要求韩国军出兵吗？”当在野党在国会上这样强烈质问西村长官时，他就用“这无非是个人的想法”一语，搪塞了自卫队海外出兵的问题。但是，西村的话真的就是西村本人的“想法”吗？同年九月，在东京举办韩日议员座谈会时，韩国派来三十二名的议员团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陆军总参谋长闵瓉植在议员座谈会上的发言。闵某向佐藤首相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日本的援助，韩国就要垮台。望日本不要把韩国视为他国，要果断地予以军事援助。”西村长官的自卫队出兵海外的发言和闵瓉植军事委员长要求军事援助，虽间隔两个月的时间，但认为他们两者之间没有什

么联系，那就太天真了。

增原防卫厅长官因公布天皇勉励自卫队“尽忠”的训辞而被革职。但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他落职的两星期前，美联社发出一则消息。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次官克雷闵特，在那些应《时代》杂志的邀请访问华盛顿的“日本实业界寡头们”的面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日本每年要向韩国提供一亿美元程度的军事援助；（2）要修改现行宪法，开拓自卫队海外出兵的道路。同时，韩国要求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的风闻也在不断地流传。

美联社的报道和天皇的话之间的一致，难道就是偶然的吗？六月十八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日本社会党收到有关日本对韩军事援助的秘密文件的消息，象是有意证明它并非偶然。据报道，这个以“关于日本防卫政策”为题的秘密文件的内容是：日本向韩国提供外表上不能认作军事器材（卡车、通讯器材等）的东西，韩国就从这里得到财政上的余力，增加军费开支。这对朴政权来说，无疑是一条减轻他头痛的好消息了。

五千亿圆的所有者

韩国同北朝鲜相比，拥有二倍多的人口和居世界第四位的庞大陆军。据他们说经济发展也非常炫目，歌颂着繁荣。那么朴政权何以怕得一味投靠日本的军事力量呢？我们可以用各种事实说明这种理由，但是，让我们探讨一下政府怀疑国民和军队忠诚的根据之一——极端的偏富。

据韩国政府发表的资料，年收入不满九万六千圆（每月收入八千圆）的达一百四十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如果把每户人口按五名计算，每人的一年收入为一万九千二百圆，按现在的兑换比例（一美元等于四百圆）计算，仅等于五十美元以下。今天，日本的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为三千美元以上，而在韩国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却过着一年不足五十美元的生活。据公布，全国饥饿儿童达一百二十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但在实际上要比发表的数字更为严重。报纸说，在汉城中心常常发生这种事件：在学校买不起午饭的穷家饥饿儿童，成群结队地向买午饭吃的孩子们施加集体暴行。

与此相反，南朝鲜还存在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富裕阶层。据说，这里有四个人，他们不是企业家，是有权有势的官僚。他们的私有财产竟超过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额的百分之五十。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因为私有财产达三百亿圆以上，曾经在国会上受到追究（一九七〇年）。那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额是一千八百亿圆。韩国政府的要人们怕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对北朝鲜怕得要命呢？这是不需要我来解答的。

建立在贫穷之上的政权

据汉城大学（医学院）所做的调查（一九六七年），汉城市居民户主的百分之三十二是失业者。

韩国政府采取的抵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归根结底，就

是降低农产品价格。

在韩国，政府支付的大米收购价格，没有一次超过农民的生产费。这样一来，农民无法生活，弃农离乡，涌向城市。一九六〇年，汉城市的人口为二百五十万，到一九七二年竟突破了六百万。

一九七〇年一月，韩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

弃农的农民的增多和城市失业者的剧增，对朴政权说来，虽然是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但是也有对朴政权有利的一面。

朴政权的经济政策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增加出口，引进外国资本。朴政权正是把外国资本的“存在”，看做是对他们的军事保护的保证。他们把低工资作为增加出口和引进外国资本的决定性手段。城市里聚集着无数的产业后备军，他们身在工资再低也不敢说一句怨言的处境，这对朴政权是十分有利的。

汉城延世大学的聘请教授杰·普莱顿斯坦说，听任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朴政权的有目的的政策。

不堪忍受的困苦生活，叫人无暇过问政治；叫人提心吊胆，唯恐丢了官职落到最贫穷的境地去，这也不是不利于朴政权的稳定的。

把国民的贫穷当作维持政权的“群众基础”，是朴政权的存在的一个特点。

远大的设想

戴高乐在法国国民中所以能够起到教祖一样的领导作用，一句话，可能是因为他在民族受难的时期进行了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他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所以这一功劳对法国国民来说，也是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情。

然而今天，朴正熙总统却自称自己是韩国的戴高乐，并且把“十月维新”同法国的第五共和国相提并论。看来，朴正熙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纳粹”的走狗，忘记了自己参与美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夺去了一万多名青年的生命。戴高乐修改法国宪法的目的，在于加强总统的权力，是事实。但是，他向国民公布了宪法的内容，使他们深入地进行了讨论，充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然后才修改了宪法，并且通过国民投票检查了对自己的信任。在国民投票中如果失败，戴高乐是准备把政权交出来的。但是朴正熙的情况则不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直到距离对修改宪法举行国民投票的日子只有两周时间的时候，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几乎没有一个韩国人清楚地了解新宪法的条款”，尤其是对新宪法论是论非是严加禁止的，并且威胁人们如果违反这一禁令就处以严重禁闭处分。

在进行国民投票之前，朴正熙威胁说，如果改宪被否决，就将这看作是国民不希望南北统一的证据，“将采取别的方法”。

“别的方法”是什么，并不清楚，但是即使在国民投票中失败也不打算放弃权力，这一点是清楚的。

朴正熙把自己比做戴高乐，但是为戴高乐的名誉着想，这恐怕是不公平的。韩国人并不那么无知，以至不知道这是不公平的。

于是，朴正熙迫切需要孤注一掷，想出什么妙方来收买人心。

这就是据说将在一九八一年实现的每人平均产值一千美元的设想。但这不过是用数字愚弄国民的骗术。为了粉饰这个骗术而必不可少的，就是日本的经济援助。

假如，骗术被揭穿，民众的反抗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朴正熙准备依靠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日本的军事干预。朴正熙一直期望日本为了保护对韩国的投资所获得的“权益”而进入韩国。

据说，一九七三年六月，金钟泌访日的时候，向田中首相提出要求，为了发展韩国的重化学工业，请求日本投资总共达五百亿美元。

五百亿美元，这是超过韩国目前国民总产值五倍的巨款。

当这笔巨款实际投入韩国的时候，韩国能不能作为韩国而存在呢？

不过，投资越大，对朴政权就越有利。

军事干预的确切性也与之成正比例，愈益增大。

六月二十三日，朴正熙抛出“两个朝鲜”的路线，开始走上了固定分裂的道路。

他打的算盘是要引进日本的力量，使之充塞韩国，以阻挠统一。事实上，它追求的是“一个朝鲜、一个日本”。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了以《韩国对重工业的向往和日韩合作》为题的社论。社论提出警告说，日本对韩国的援助和投资，“是对特定阶级的帮助，将招致加剧贫富之差距的”结果，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这篇社论的论调，没有不对头的。我想，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遗漏了？

朴正熙认为日本的投资是对自己政权的军事保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最近急剧增多的资料证明这一判断是没错的。

三、日本变了吗？

今年六月十二日在东京召开的韩日议员座谈会上，田中首相说：

“日本同韩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衷心希望韩国安定和繁荣。虽然会有种种困难，但恳切地希望南北对话成功，实现自主统一。”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日本政府的政策中，找不到什么证据足以使我们相信日本现在希望朝鲜半岛的统一。过去当中国人呻吟在被分裂的悲剧中的时候，日本的政策是助长分裂、固定分割。日本曾经宣称要为中国的统一助一臂

之力，并斡旋"上海南北和平会议"（一九一九年二月），但是在背后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同已经变成傀儡的军阀政权签订了秘密军事协定（日华共同防敌协定，一九一八年五月）。不言而喻，日本说是"为了对付危害远东全局的和平与安全"的这一军事协定，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从这一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这难道是欠妥的吗？我们很难找出什么证据使我们充分相信今天日本的政策不是"南北两朝鲜之间的争斗，不仅无害于我们，而且我们应该努力乘机获取我们的利益"。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三年第九期）

韩国民众的志向

郑敬谟

一、来自北方的威胁

继大平之后，木村俊夫于七月十六日（一九七四年）深夜，就任外务相的职位。而第二天就有前韩国“国务总理”白斗镇等人物急急忙忙前去祝贺新上任的外务相。

据报刊（《读卖新闻》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报道，木村外务相对金大中问题表示不满意，说韩国方面“如不认真考虑是不行的”。而前任国务总理白斗镇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倒很奥妙，他说，“因为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过于大叫大嚷，所以反而成了个棘手的问题。对他的袒护，却招致了不利于本人的结果。”

如果，日本国内没有“大叫大嚷”，那末，身被捆绑在重物拉到绑架船甲板上来的金大中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韩国政府“劝告”说，“要是大叫大嚷就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日本政府在早川、太刀川这两个人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结果碰到了什么问题呢，对这些问题不想多谈了。

可是，日本向韩国要求解决金大中的问题，决不会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为“袒护”金大中这个人的。我想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不行的。我认为，日本所以提出这个问

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同合法地侨居在本国的所有外国人的人权和被韩国侵犯的本国主权的根本原则有关。

对这一事态，如果不了解所发生的问题的本质，而毫无根据地只把问题看作对特定人物的“袒护”，那么说朴正熙及其派系的人物对日本的真实要求，乃是意味着对朴正熙他个人的“袒护”喽。

凡是韩国人，虽然不敢公开地说，但对于同朴政权有关系的人的这种卑鄙的思考方式和对日本的无止境“献媚”的丑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恶心。且说，据报纸（同上报）报道：白斗镇向木村外务相“举具体实例说明北朝鲜的威胁，并强调了进一步加强日韩友谊的必要性。”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的“具体例子”可能是指最近（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东海发生的击沉韩国警备艇863号事件说的。

但是，据同上的报道，白斗镇和木村外务相的交谈时间总共只有“二十五分钟”。而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白斗镇怎能把事件的真相“具体地”讲给木村外务相听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我对白斗镇的说明做一下补充，想就在韩国国内象我这样被剥夺了发言自由的韩国人怎样理解“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且如何对待最近作它的根据的“警备艇事件”做个说明。制造两个日本人参与的民青学联事件并把这个事件的嫌疑犯大量判处了死刑，对此他们终究也是用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个名堂来使其正当化的。日本读者必须认清这一点。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韩国警备艇863号被北方的海军击沉，是南北双方都承认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这艘

警备艇被击沉之前，在哪个地点，做了什么，这一点只根据韩国方面公布的资料是根本无法了解它的真相的。而且这艘警备艇不是属于美国指挥下的韩国海军，而是属于韩国内务部的，美国方面似乎也没有掌握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因此北方是否在南朝鲜领海进行过侵犯行为和“威胁”，只分析韩国报刊上的文章是无法弄清其真相的。

据《东亚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报道，韩国国防部公布：警备艇863号被击沉的位置是“军事分界线以北三至五海里的海面”。

但是这艘警备艇并不是起初就在分界线以北的海上，“而是遭到企图截获并带走它的北方警备艇的攻击后，进行交战，激战后被迫赶进分界线以北”而被击沉的。

那么说，这艘警备艇的原来的位置呢？据国防部公布，它原来是在巨津以东二十五海里，军事分界线以南九海里的海上。也就是说在韩国的领海上。

每当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韩国方面发表的和北方发表的通常是有差异的。但是据朝鲜通讯社在报道（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平壤广播电台播音时说，在战斗开始当时，韩国警备艇的位置是在“水原端以东十一点三海里，军事分界线以北六点二海里”的海上，是北方的领海。

既然没有目睹现场，只凭双方的公布，是无法判断哪一方的主张正确。但我们是韩国人，可能是引水先到自家田的心理作祟，很想相信本国的公布，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时也疑惑强词夺理的兴许是北方？

但是，七月一日国防部长官徐钟喆出席国会的国防委

员会作了同第一次公布的内容相差悬殊的发言。听了他的话之后，人们疑惑是谁在做抵赖，更使人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

据徐长官报告，发生事件当时，这艘警备艇在执行护卫渔船队的任务，当时约有四百多只渔船在这海域上捕鱼。

我们按照韩国国防部的公布假定这艘警备艇最初的位置是军事分界线以南九海里的海上，那末这艘警备艇要从这里直线行驶到被击沉的分界线以北三至五海里的地点，至少也得航行十二海里。据说遭遇时间是八点五十分，被击沉的时间是十点三十分，就是说交战时间竟有一小时四十分钟。

既然这样，为什么在那么多的渔船中间没有一个人目睹这场海战或听到炮声响呢？

新民党（在野党）的金守汉议员拿这个问题向徐长官追问说：“警备艇863号的任务是护卫渔船，这是不是假话？”（《朝鲜日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

徐长官作答复的时候窘出了一头汗。他作更正发言，说原来发表的警备艇863号的位置为军事分界线以南九海里这一点，经过“综合分析”是有些出入，以后经过“重新调查”，查明了原来的位置是分界线以南一海里的地点。

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了“重新调查”，他并没有提到。

上述问题就算是那样也罢，可是，分界线以南一海里的海面是韩国渔船绝对不能接近的禁止海域。如果韩国渔民北上到这个海域，就免不了依据反共法及其他法律被判

处死刑。如果徐长官的更正发言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对这艘警备艇执行护卫渔船任务的主张，不禁要画个大问号。对这一点大家逼迫徐长官做答复，他大为惊慌，不知所措，竟巧妙地辩解说，“那艘警备艇为什么北上到分界线以南一海里的地点，我本人也不禁感到大惑不解。”（《朝鲜日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

在上述答复里，他还补充一句更正说，警备艇被击沉的位置，不是最初公布的“分界线以北三至五海里的海上”，其实是“分界线以北六点五海里的地点”。据说这个更正是根据这艘警备艇最后发报时间为“十点三十分左右”这个事实推算出来的。韩国海军使用多么精密的电子计算机这可能是属于军事秘密的吧，但是，仅仅根据最后的发报时间，用什么公式怎样算出被击沉的位置，真是件鬼晓得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知道的只是北方在公布里指出，警备艇的沉没位置是“分界线以北六点二海里”这个事实。

韩国警备艇863号是否真地执行了护卫渔船的任务，并且它的最初的位置是否确实在分界线以南这个问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但是可以断定，这个事件的真相和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同白斗镇对木村外务相“肯定会说了的”话，是有相当的距离。

对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在黄海发生的“白翎岛事件”，我们韩国人也感到有不少问题是疑惑不解的。当时渔船“水原”32号和33号作为间谍船被北方击沉、截获的时候，韩国方面说这些船是“时速只有三海里的破旧船”。这

是韩国方面为证明这些船不是间谍船而提出的唯一的“证据”。 如果有人怀疑韩国政府是不是为了引起什么纷争而故意派这些渔船侵入北方水域（这种人在韩国内外是大有人在的），那末不得不指出，把“水原”号的时速为三海里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只船不是间谍船的“证据”是很不充分的。不用说用“时速三海里”的船，就是用一海里的破旧船也完全能够达到目的的。

我还要附带地说，在被击沉的渔船上的二十五名船员中，许多人不是渔夫，这种疑问是比较浓厚的。据说，有个韩国记者为了报道“遗属”的悲哀并谴责北方的“暴行”，查寻了他们的住处。但是曾被公布的“渔夫”当中至少有四个人的“遗属”，终于没有找到。

反抗派诗人金芝河要向国民发出呼吁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事态吗？

长诗《民众的呼声》中有这样的一节：

为了镇压奋起的民众，
专事利敌岂有此理。
为了幸免政权危机，
挑起局部战争实难耐。

目前北方拥有的军事力量，对朴政权来说是个潜伏的威胁，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照这种说法，南方拥有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北方同样是个潜伏的威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是出于这种意思的“威胁”的话，那是南北

之间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事实，并非新奇。那末，为什么朴政权监禁数千名学生，把七十七岁的前总统提交法院审判，象金芝河这样除了一只钢笔以外再没有什么武器的诗人判处死刑了呢？难道真的有过能够足以使这些正当化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吗？回答是很明白的：“没有”。

我想目前，朴政权实际上认为危机的却是冷战在逐渐消失， 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出了紧张局势的缓和。 朴政权应该冷静地承认这种新的局势所招致的美国的“保护能力”的削减和驻韩美军的撤退的可能性，寻求适应这种现实的道路。然而， 看来朴政权走的却是与此相反的道路。 目前，朴政权的所作所为，很象是生怕自己成长为大人，而乞灵于年幼时常用过的方法（例如夜尿症）的那种退行性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这的确是危险的。朴政权似乎很难忘却在过去“普韦布洛”号被截获时美国第七舰队主力麇集在元山湾时所感到的那种无限欣慰。“普韦布洛”号，请你再来一次吧，这就是他们的心愿。

朴政权有可能摸索这样的道路，即向北方挑战，把美国引进军事纠纷里，从而使自己苟延残喘。这才是不用说日美两国，就连北方的共和国也应该慎重对待的实际上的危险。

二、“第二经济”的悲剧

据说朴正熙曾把早川和太刀川判处二十年徒刑，而他

要以释放这两人为代价要求日本政府交出三亿美元。

我认为我掌握的日语词汇包括体面人不常用的下流话在内，是比较丰富的。我寻遍了一切形容品质卑劣的人的名词和形容词，然而，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我作为韩国人对自国“总统”的轻蔑之感。回顾一下朝鲜悠久的历史，也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尤物做当权者的前例。

下面介绍韩国人写的以《蜘蛛》为题的一首诗。

蜘　　蛛

用同胞的血肉喂肥的，
你这恶魔般的黑虫，
枝枝布满罗网，
喷出恐怖的云雾，
白日策划专制的阴谋，
黑夜招进死神逞凶。
在怒目和诅咒中，
扩张黑暗疆域的魔种。

在女魔的催眠声中入睡，
在凶险的梦境里，
把星光统统嚼吞，
人世间一切善良的美梦，
都被你那八只魔爪扯碎。

尽管凄寂象岩石般坚固，
黑夜象海底般深沉，
终有夜尽日出之时，
万道阳光普照天地，
带来生命的狂呼，
它将宣告你的灭亡。

这首诗的原作者的名字不便公开，然而，这位诗人的胸中燃旺着的是什么，那是无须赘言的了。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革命前的黑暗年代，曾写过一首诗《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人的悲哀啊，
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啊，

这是诗的开头，词藻很朴素，但凡是体验到生活在朴正熙统治下的悲哀的韩国人，都不禁感到正中痛处。记得有一位同乡的前辈，在东京相逢的时候，举着啤酒杯，说道："现在的韩国学生和过去的学生的差别在于现在的学生心里充满悲哀。……"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哽咽起来。

还是书归正传吧。

韩国有叫"第二经济"这样一句别致的词，这是朴正熙亲自造出来的词。这个词的定义还不很明确，似乎是指能够发展经济（第一经济）所必需的合理的意识或价值的意识而言的。韩国政府曾经大肆宣扬过这"第二经济"。

乍看起来，这种思考方式使人联想到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意识这种马克思的格式。如果说，“第二经济”论说教的是：为了基础的巩固，应该由意识挂帅，这该是谁的思想呢？我以为，朴正熙是曾经研究过马克思的人，所以发出了这种言词。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种推测，完全是误解，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

据朴正熙的主张，唯有经济即“赚钱”才有“头等”意义。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些伦常道德之类都可算做是次要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朴正熙热心经营的“妓女观光”，就可以不问自明了。

这种“第二经济”式的思考方式，究竟把社会拖入什么样的堕落的深渊中去呢？我想可以把引起世界注目的“儿童输出”当做尺度来衡量这个深渊之深度。

韩国的输出每年平均以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而今年（一九七四年）的目标是四十五亿美元。当然，这个数字里也包括日本企业的产品，因而实际数字要比他们所宣扬的少得多。但不管怎样，韩国的输出额确实在增长，而这里包括着几千尊曾立守韩国人陵墓的石像。

但是，我在这里当做问题的并不是用石头彫成的石像，而是人所生养的活着的孩子。

传说，过去在革命前的中国，有过什么“孩儿买卖”，遇到战争或荒年的时候就有出卖孩子的现象。

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民歌：“卖子莫摩头，摩头眼泪流”。据说，母亲坐在路边用哽咽的声音说：“要不要小孩

子"这种情景也确实有过。这种悲惨的故事如今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回顾昔日的辛酸，感激今天的幸福，即"忆苦思甜"的故事，可是在今天的韩国，这正被当做当前的问题提了出来。

由韩国输入儿童的国家是美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当然它们表面上采取收养"孤儿"做养子的形式。据政府的公布，被出卖到外国的养子的数目，一九六五年达四百五十二名，到去年（一九七三年）竟剧增到四千六百八十八名。然而，作为养子被出卖到外国的孩子当中，大多数不是孤儿，而是虽有父母但为了几个钱而被出卖的孩子占大多数。据说在大约五千名儿童当中真正的孤儿只有百分之二十。儿童的身价是一千二百美元到一万二千美元。据说，在世界范围内对儿童的需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今天的韩国对"儿童贩卖市场"成了主要供应者。（《日本时报》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

这种人身买卖没有韩国政府的默许是做不到的，那末，朴政权"输出"本国的儿童所"赚的钱"究竟有多少呢？希望大家体谅，韩国是个多么渴望"忆苦思甜"的时代之到来的国家。

令人奇怪的是，朴正熙的"第二经济"体制对人口"输出"很热心。曾经向越南派兵，赚了大约十亿美元。以日本人为对象，利用妓女搞"慰问"输出，每年赚了约二亿美元。由于遭到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反对而一时停滞的向冲绳输出工人的活动，看来目前又在顺利进行。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派去了第一批三百名为开端，今后将有许

多韩国劳工陆续派往冲绳。目前，日本和苏联之间正在促进关于开发西伯利亚的会谈，而朴政权也企图伺机“参加”这个开发。而他们的所谓“参加”也不过是要派一些劳工去的。要说将在所谓“参加”的美名下被派到西伯利亚去的韩国人劳工，同过去日寇统治时期的“强征劳工”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真是令人怀疑的事情。

第二次大战时期，日本的煤矿大多是靠被强征的朝鲜劳工经营的，那时他们所体验的悲剧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医好。而现今又出现了西德的大部分煤矿靠韩国人矿工经营的事态。这是朴政权大力实行“人力输出”政策的结果，不管是在日本土地还是在西德土地，韩国人的悲剧性遭遇是毫无两样的。为什么韩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挖本国的煤呢！

朴政权还向世界各国“输出”大批护士。假定每年一个护士学校有一百名毕业生的话，那末留在韩国的数目就不到百分之十了。医生的情况也是同样的。目前，出现了一种怪诞的现象：日本各地的无医村的医疗事业逐渐由韩国人医生来承担。

但这也决不是因为韩国的医生或护士过剩而“输出”的。

韩国的农村，毫无例外地都是无医村，地方城市的“道立”医院也是没有一座配满医生定员的医院。这是因为靠荒废了的农村和地方城市的经济力量是无法保障医生所要求的收入的。所以，医生们自然集中到汉城。据说，就是在汉城，六百万人口中得病能够得到医生治疗的人还不

到百分之十五。被背到医院的孕妇和生急病的孩子们，因为交不出五万到十万圆的押金，在医院门口死去，这种悲惨的消息每天都在传来。就是这样的韩国，把大批本国的医生和护士向国外“输出”的现实，不是悲剧又是什么呢？这恰恰说明腐败透顶的韩国社会的病废。

再介绍另一首诗。

被“输出”到西德的一个韩国人矿工，由于冒顶事故脚脖子给折断了。他被抬到异国医院。当时为了给他治伤出现的护士，也竟是随“人力输出”的波涛漂泊到德国的韩国姑娘。男子变成了残废；姑娘受尽折磨和歧视，况且西德官宪利用她要取得“逗留许可”这一弱点，糟踏她的贞操是个常有的事。他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邂逅相逢，由于各自的哀衷，交头痛哭。下面援引的“德国诗抄”是咏叹韩国式的独特悲哀的。这首诗登在韩国文杂志《韩阳》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来自韩国的护士姑娘，
我们的邂逅相遇，
偏巧在异国他乡，
是在德国的病房。

你见到因出其不意的冒顶事故，
失掉一只腿的我，
姑娘啊，为何浸沉在如此痛切的悲伤里，
哭成了泪人！

你为吃力的活儿所折磨，
鼻血染红了白布的那天，
老奸巨猾的护士长，
血口喷人地痛骂了你，
你整夜流泪未曾合眼。

你的泪水，
医好了我那
创伤的疼痛。
但你自己
被无形的锁链缠住，
驱不散自己的悲哀。
他们甚至把你的名字
也改成德国式的，
你的身世实在辛酸又可怜。

这首诗吟咏两个韩国人的悲伤后，下面用报仇的决心作了结尾。

……不只是我们两人，
是所有同胞都在愤怒。
姑娘啊！
在这痛哭声中，
我们正在磨炼着
决心报仇的心中的匕首。

然而，韩国人的这种悲伤是“第二经济”所招致的，决不是韩国人天生的悲哀。不怨祖先是朝鲜民族的美德。韩国人的仇敌决不会是自己的祖先，这岂不是很明白的吗？

三、朴正熙打错了算盘

朴正熙在宣布“维新体制”后，为使自己的终身专制执政正当化而提出的所谓正当的根据， 大致可以归结 为 两个。

其一是除了他就没有人能够构筑“反共堡垒”，来抵制“来自北方的威胁”；另一个是假若现在他下台，那些辛辛苦苦取得的出色的“经济发展成就”就会被中断并化为泡影。

同时，他还借助于这两个所谓正当的根据，主张：凡是批评现行体制的人，不管他们举行单纯的示威游行，还是用笔墨表达意志，都一律处以极刑，清除掉。

就这两个“根据”而言，我认为朴正熙做了严重错误的打算，以至关系到自己的命运。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没能理解他提出的反共招牌，反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是个不识时务的做法。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抛出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加强反共体制。从这以后，韩国的“第一国策”，即韩国这个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反共。所谓韩国这个国家存在的理由为反共，这就是说，假若共产主义不存在，那

末韩国这个国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作为一个国家竟然提出这样的理念，这未免太粗鲁了。

美国作为韩国的生母，用力炮制韩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使韩国起反共堡垒的作用。 因此， 从这种观点来看，应该说朴正熙以反共作为第一国策，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那是因为一九六一年当时，美国和韩国在“反共”方面是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今天美国所追求的是缓和紧张局势，起码不是大肆宣扬反共思想来加剧紧张局势。朴政权在最近时期特别为之卖力气的反共政策，反而威胁了美国的利益。

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美国曾在四·一九学生起义后，冷酷无情地摈弃李承晚的那种态度，就可以推测到。

当时，以学生为首的民众怒涛般的呼声，一要求李承晚下台，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就立即发表声明，指出韩国国民的要求完全是出自“正义的愤怒”的，并且他们表示态度，要同李承晚断绝关系。有这样一段广为传播的小故事：当时的美国驻韩大使麦克脑吉，是擅长弹钢琴的人，当李承晚的下台定局的那天（四月二十七日）， 他用钢琴弹着贝多芬的F短调小奏鸣曲，沉浸在欣喜之中， 一直到深夜。

李承晚的下台固然是在学生起义的压力下的屈服所带来的，但在这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同情学生而摈弃了李承晚。

那末，美国为什么同李承晚断绝了关系呢？当时，对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来说，实现韩日关系的“正常化”是燃

眉之急。可是，抱有顽固的反日情绪的李承晚，不甘心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予以令人满意的帮助。从维持政权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李承晚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

由此可以断定：今天朴正熙正在重蹈复辙，犯着和李承晚同样的错误。目前美国追求的，不是高举反共旗帜，加剧紧张局势，而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光荣地撤离”韩国而窥伺机会，这才是美国的迫切要求。

在韩国，自从发表七·四联合声明后一度收敛了的反共浪潮， 近来急剧高涨起来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朴总统竟用极端的口吻说：“共产主义是无视人类尊严的天下最大的罪恶”“共产主义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韩国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朴正熙的这种信条是否有理，他本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正是践踏人类尊严的罪恶，这些姑且不论。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朴正熙的这种反共叫嚣，是否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

美国人至今不管朴正熙干出什么勾当，对韩国问题是不加注意的，而最近他们却突然有所醒悟似地对朴正熙大加谴责，而且这一谴责又十分尖锐。由于拘泥于东洋人式的礼节，日本言论界对露骨的言词是有所忌惮的，但是美国人与此不同，最近他们反对朴正熙的言论尖刻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可以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刊登的格列高利·亨得逊教授写的文章为例。亨得逊教授

曾任驻韩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现在塔夫茨大学任教，他是熟悉韩国的人。

他谴责朴正熙说：他是一向以背叛某人为代价来苟延残喘的卑劣的汉子， 并说朴正熙过去的经历谴责了 他 本人。如果说朴正熙如今还有他未曾背叛过的人物，那就是日本天皇。亨得逊教授的这句话真是淋漓尽至。

我这篇文章并不是为指责朴正熙而写的，但为帮助读者理解后文的真意起见，下面介绍亨得逊教授的一部分文章。朴正熙的为人究竟有几分可以信赖的，他本人的经历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间，他身为国防警备队军官， 向美军政厅宣誓尽忠， 但他掀起共产叛乱（一九四八年的丽水事件——作者注）来违背了这个誓言。

第二，从一九五〇年起，他作为韩国陆军军官，宣誓负责保卫韩国的合法政府。但他发动军事政变（一九六一年），违背了这个誓言。

一九六三年，他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宣誓要遵守他在这以前（一九六二年）一手炮制的宪法。但他在一九七二年践踏这个宪法（戒严令——作者注），违背了誓言。

他把金大中提交法院审判，这又违背了他对日本外务相的诺言。

他宣誓要尽忠，而且至今也还毫无违背地遵守誓言的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日本天皇。他曾作为皇军的一员同盟军打过仗，对日本尽忠一直到他被盟军撤去职务的那天。

总之，目前美国如此严厉地批评朴正熙的理由，无疑是他们对朴正熙蹂躏人权感到愤慨。看来，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空前强硬的。据说：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公函（"韩国的人权问题"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里面，列举了朴正熙残暴地蹂躏人权和镇压言论的具体实例，并如实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当局对朴政权恐怖统治的不满。（《读卖新闻》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罕见的破例。美国这个国家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伤，就是在被保护国横行任何非人道的压迫，也不会为此而批评或非难那个国家的政权或当权者的。

在这样的美国，无论在民间还是政府，都发出如此强烈的反朴正熙的呼声，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换句话说：可见美国追求的目的和朴正熙追求的目的已经背道而驰了。朴正熙越走向反共，这种背驰就会越严重。再说，这种背驰越表面化，朴正熙就会越采取把美国拖进他所制造的危机中去的行动。这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可能美国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危险。

当朴正熙叫嚷"共产主义者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时候，他也就用自己的嘴宣告了自身的毁灭，这样说也决不过分。他对时代的错误看法所招致的自取灭亡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其次，朴正熙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对"第二经济"的评价。他似乎还没有觉察到他自己的评价和国民的评价是恰恰相反的。

韩国的定期国会规定在每年九月二十日召开，但一直到七月末的今天，韩国政府还没有指望编制应提交国会的补充预算。也就是说没有财政来源。地方公务人员的薪金也已经拖欠了三个月。

朴政权为摆脱这种困境而做的打算是，给早川和太刀川两个人判处二十年徒刑，然后要求日本政府交出三亿美元作他们两个人的身价。我作为韩国人由于愤怒和羞耻，不禁感到浑身的血液好象在倒流，但不论怎么说，朴正熙的"第二经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是众所周知的。

目前， 我们韩国人所以大声诅咒朴正熙的 "第二经济"，倒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什么复杂的和奢侈的东西。

我们韩国人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国度的国民为具有生活在人间社会里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自豪感，而要求最起码的必要条件罢了。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不把本国出生的儿童往国外 "输出"、 不强迫本国的年轻妇女为外国人当淫妇也可以活下去的那种经济制度。

我们指望本国的人们能够不为外国劳动，而为建设本国的未来，抱着满腔的希望和喜悦，挥汗奋斗。

我们要求根除病人因为交不出医药费而死在医院门口的惨状，建设一个人人都能毫无例外地受到治疗的社会。

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要求废除迫使本国的医生和护士丢开本国的病人流落到日本和西德去的现行制度。

据说，汉字的"欠"(日文里"欠"与"缺"通用——译者注)字是象征人们为债务所迫作卑鄙行为的字。看来个人生活中

的“缺乏”也罢，有碍于人们享受幸福的社会的“缺陷”也罢，終究都是与在别人面前低头哈腰这种状态有关的。一句话，现在的韩国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

我们韩国人宁愿一天少吃一顿饭，也要求建立一个能够不对任何人无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低头哈腰乞讨钱，而昂首挺胸地活下去的那种社会制度。至于把没有罪的外国人囚禁起来，索取其身价的厚颜无耻的勾当，就不再多提了。

我们韩国人的上述最起码的要求和朴正熙所推行的“第二经济”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而朴正熙却扬言：只有“第二经济”才是至高无上的，反对它就等于犯死罪。

在“第二经济”所强加的痛苦中，韩国人在他们的心中磨炼着“复仇的匕首”，而朴正熙却没有听出这磨刀声。

趁此机会，我想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附带地叙述几句有关日本政府的错误想法。

一八五九年，《欢喜》杂志登载的十九世纪著名的学者兹·斯绰阿尔·米尔的随笔“干涉的逻辑”中，有这么一段话：

“为压迫本国人民而需要外国援助的政府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外国的支援毕竟只不过是一个专制体制对另一个专制体制表示的同情而已。”

我并不是说日本政府是专制体制。但是，米尔的关于为了压迫本国人民而需要外援、没有这种外援就不能自立的政府的叙述，在今天的时代也仍是一条真理。

日本的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朴正熙肆行无

理的压迫，从而被韩国的民众指责为同谋者，如站到这种立场，就不可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应该防止韩国民众胸怀的匕首指向日本。

今天，日本政府正该寻出两个民族之间实现真挚的和解的道路，应该说事态已经发展到危在旦夕的地步了。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泥泞之路

韩国通讯　　　　T・K

秘密审判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讯

当人们想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对事实和自己对它的看法以及写出来的东西这三者之间的距离总感到焦虑不安。现在，对我来说也有许多事实要写出来。但是，当真要下笔，却感到力所不及，这实在是令人为难的事。同志们在法庭上和监狱中进行的斗争，也可以说这种例子之一。现在，连同他们的家属接近都有很多困难。对当前的事态也有很多想要写的东西，但在提法上又不能不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尽管自己缺乏能力能够生动地表现出自己所想的东西。

我想用朝文和英文写的题为《被告者家属在法庭上的见闻》的文件已经广泛得到介绍（编者注：《世界》杂志第九期）。在这里不能不涉及到从那以后，其家属们所遭到的迫害。

诗人金芝河的母亲和神学院学生李光日的母亲被押到了中央情报部。她们为这份只有两页的文件而受到了审讯。

她们两人身受严刑拷打，终于昏倒了。对于住院中的一位妇女，竟有四名审讯官来审讯。另有一位妇女被拉到警察署，通宵受到了十名警官的审讯。然后，警察拉着这些妇女东转西找，到她们亲戚那里一一对质，盘诘她们在审判中和审判以后曾到过什么地方。那些妇女当中也有不堪折磨而昏倒的。

有许多妇女遭到了这种横祸。曾护理这些妇女的护士们，听到她们的这种遭遇，都流下了眼泪。护士们很想把她们留在医院里让她们稍睡一会儿。可是，警察们又把她们拉走了。此后，对她们表示的好意，不过是允许她们在警察署刑房的桌子上趴几个小时。其用意无非是用痛苦和折磨迫使她们不谈旁听到的内容。警察们正在搜寻制成那份文件时用过的打字机，但至今仍没有找到。

近来，我每当看到当权者的走卒们所干出的这种非人的勾当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军人们往往一碰上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干出野蛮暴行来。那时，我联想起这么一句话：对别的民族象绵羊一样驯良，而对自己的民族却象豺狼一样凶暴。这句话可能是古人用来训诫自己的。但是，如此疼爱自己儿女的人，对别人的儿女怎么会那样凶暴呢？难道这是军人、警察、中央情报部特务的职业所带来的性格吗？

近来，在没有家属和律师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这样的事很时兴。因为不把审判日期通知任何人，所以，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去等候发表当天受审人的名单。如果在名单中发现了自己的或友人的丈夫或儿子的名字，就急急忙

忙去告知受审人的家属和律师。有时，也有些人因为来迟了一步，只好远远地望着受审后被带走的亲人的背影流泪。

这里举一个实例简单地介绍一下。有一天，十多名学生受审判。有几位家属到军事法庭前院去看到了黑板上贴有他们儿子的犯人号码。审判早已开始了。家属们苦苦哀求，才好容易走进了法庭。审判持续了四个小时，学生们并没有否认他们反对“维新”。出示的物证不过是一些标语、油印机和声明之类的东西。审判官诘问他们，获释后，是否还要搞这类活动。有的答道往后在行动上将多加谨慎。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不能断定说不重复这种活动。”审判官要做最后确认似地问道“还要干吗？”许多人回答说“不能回答。”

第一次公审，就这样结束了。下一次的公审日期根本没有公布。那时就要做求刑公审了。军事法庭只在两三天内就做出判决。审判都是按照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进行的。至于刑期，据说由朴正熙一一批示给中央情报部。不然，他就放不下心。据说，他对外国人说，经常有人企图谋害他。可能是由于他得了这种被害妄想症，对军事审判总要亲自过问。第二次公审时曾有过这样的事。出庭的不是家属们选定的律师，而是陌生的律师坐在那里。坐在后排的家属们交头接耳地说，这个人不是真的律师，可能是某机关的职员。他们选定的律师却根本不知道那天进行审判。在没有父兄或妻子出席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有时，审判官问被告要不要请律师。被告回答说没有必要。审判长就随声说“那就好”。他对他自

己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也能做出“公正的审判”这种“光明正大”的气度感到满意。真是“天字第一号”离奇古怪的审判。

他们就是这样古怪地“执行着法律”。最近，我收到了一份有六七张的文件。这是转入地下的学生们写的报告。里面写的是有关曾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无期徒刑的金芝河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材料。

报告首先概括了反朴正熙运动的历史。报告在谈到一九六五年以后时期进行的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时写道：当时他们曾忧虑了日本将从经济上控制韩国，而如今这不是已经变成现实了吗？从此以后，学生们奋起进行了反对“营私舞弊”和“舞弊选举”的斗争；一九六九年的反对修改宪法三次连任总统的斗争；反对学校军事教练的斗争；一九七一年批判和反对舞弊选举的斗争。这是“要求改革的唯一明确的国民的呼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表示反对意见的只有学生”。然而，结果只有一声“在朴的暴力面前，无能为力”的慨叹罢了。“所有韩国人都厌恶朴的政策，而且，民众一向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强行通过了“十月维新”的一人独裁宪法。一年后，学生们要求“恢复民主”，“废除强压宪法”而站起来了。报告谈到这里指出，这个时期朴正熙做出破例的让步，来到了所谓对话的时代——暂时的解冻期。但这不过是一瞬间，很快就抛出了总统紧急措施。报告对新的示威的酝酿继续写道：

向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斗争舞台前进了。学生们通过一

九七三年的运动体会到各大学之间的协助有多么重要。主要院校的代表聚集一堂秘密地订出了计划。然而，中央情报部的威力之强，组织之严密，确实超乎寻常。两三名领头的学生被捕受刑了。结果中央情报部获得了有关准备在四月三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的完整的情报，做好了对付这个示威的准备。在开始示威以前，学生们还没有会集，中央情报部的特务和警察就打进来了。有两三个大学勉强得以活动， 但对我们来说， 警察的力量强大得实在难于抵挡。 一千三百多人被捕了。 连通知家长和律师都被禁止了。许多人遭到了严刑拷打。

这份报告还谈到了，中央情报部捏造事实的经过。中央情报部说学生们借“全国青年学生联盟”之名，其实则企图进行共产革命。中央情报部把威胁它的权力的其他团体和个人也都拉进这个事件中去。

中央情报部捏造事实，把据说是进步政党“人民革命党”党员的一批上了年纪的人们说成这个事件的主谋者。另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名日本人也被加进去。韩国基督教学生联盟的全体干部被起诉，说是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有联系。

报告详细地叙述了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的出身、经历、信仰，以及他们同学生运动的关系。最后做了如下的结论：

中央情报部要把这七个人处以死刑。说他们是策划流血革命的国家的敌人、共产主义者。其实，这七个人可以说是代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各个阶层的人物。有出身于富

裕家庭的，也有出身于中产阶层和贫苦阶层的；有天主教徒、佛教徒、神教徒，也有不信教的。但是，他们都有政治活动经历。他们一向是反映学生和一般国民对统治集团的腐败和压迫的郁愤而进行活动的。在他们的集会和活动计划中，根本没有同“以流血方法颠覆政府”有关的东西。他们是主张改革，要求民主自由的。根本没有提倡共产主义。中央情报部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的偏见对待了那七个人对国家的局势表示正当关心的行为。所谓共产主义阴谋，是政府害怕自己国民而捏造的虚构。

朴正熙欺骗国民的伎俩已经达到了极点。那么，他受到国民强烈的反抗，倒还能维持统治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份报告举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从军事政变后，一直巧妙地利用了军队；第二，日本政府和资本家的财政支援，当然，美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支援也要算在里面；第三，为了维持权力，巧妙地利用国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那些为改变现状而做某种尝试的人，无论是谁都要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而遭到逮捕、殴打、受刑。他们在利用所谓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对朴来说，共产主义这个幌子确实是很中用的工具。”

这份报告指出，这个任意判处死刑的总统紧急措施，实际上是早在举行四月三日示威之前就拟订好了的。它写道，在那天傍晚，“很快就颁布这项措施的事实证明，那项措施是早在举行示威以前就拟好了的。”中央情报部也早已编好脚本，把这次没能发动而告终的示威描写成“同共产

主义相结合的流血革命”。报告对审判的情况写道：

起诉、审判全都是捏造。授命于中央情报部和朴总统的军人扮成了审判官。在拷讯中强加的东西竟然在法庭上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尽管全体被告都说那都是强加的虚假供词，但是他们根本不加理会。法庭上没有一个证人。检察官在法庭提出的证据是，证人在饭店说出的证言的录音。尽管律师们为维护被告的权利，极力对这种荒唐的审判提出了抗议，然而，弄不好，他们自己也要被捕的。有一个律师竟因反共法而被捕了。

这份报告在可以算做结论的部分谈到了对未来的展望，笔调实在悲壮。

朴总统和他的统治是旧时代权力的翻版。我们决不能重蹈复辙。我们要走新的道路，要建设为我们国家的新社会。压迫越加重，我们反对独裁的决心也就越坚强。我们的言行不是两三名急性人或急进派的言行，而是绝大多数学生和我们国民的言行。我们的行动是为提高我们国民的觉悟和意识的手段。政府压迫我们，结果将更加提高这种意识，更加促进自身的灭亡。

有一位学生被宣判死刑后，对军事审判官说：“我被扣上共产主义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而死去，这是不正当的。但是，我对死早有准备。历史将会为真实作证。”

我们对死都早有思想准备。不能用合法手段使独裁者下台。法律同朴总统的命令和中央情报部的暴行是融合为一体的。只有我们的死、我们的坐牢，才能造成发动国民

赶出独裁者的力量。我们的新社会，正在囚禁我们的监狱中创造出来。

狱中的年轻人都壮志凌云。有一个牢房的墙上，不知是谁，刻下了“宁愿死去，也不愿向敌人屈膝”的字样。他们对狱中生活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他们互相取得联系，交换情报。如看守无理取闹，就集体进行绝食斗争。神学院学生们用他们随身带着的东西做十字架，藏在头发里面，一有机会就把它送给自己的朋友，表示鼓励。坐牢的人越多，他们在狱中的相互支援和斗争将越发活跃。他们认为，只有朴政权被打倒，他们才能出狱。

一 件 回 忆

今天是金大中在东京被中央情报部特务绑架一周年的日子。在发生这个事件以后，有些人公然说什么金大中在大白天于日本首都的大旅社被暴徒绑架算不得是什么重大事件。有些日本政治家帮腔说，不管在韩国发生什么样的事态，韩国仍然是民主国家。还有些人认为，通过对金大中问题的巧妙的“政治解决”，可以很好地改善韩日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指出韩国的黑暗现状，为韩日关系的急遽恶化表示忧虑。时过一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分清，是谁正确地观察了历史。有两个日本人也被捕入狱了。应该说有不少人对历史的观察是鼠目寸光的。

今天，日本在韩日关系上，难道没有走进泥泞之路吗？同暴徒打交道，只能走越来越深的泥泞之路。日本人的真正的朋友该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些一鼻孔出气的人，而是能够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日本企业家们执迷不悟，认为朴政权的暴政对当前的利益是“有益”的，那末他们将永远摆脱不出这个泥坑。正象狱中的人们认为要想恢复被剥夺的自由就必须打倒朴政权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日本要同韩国建立正常的邦交，也得到朴政权被打倒以后才可能呢？朴政权将会把日本拉进更加严重的泥坑里去。他们已经把两个日本人关进了监狱，谁知今后接踪而来的是什么呢？看来，韩国政府对日本的蛮横，对国民也发生了影响。

无论是谁，凡是不知自重的人，就不能受人尊敬。人们对日本政府处理金大中事件的态度，解释为重视经济利益重于人权。两个日本人以小小不然的理由被捕了，然而日本政府却没有说出一句硬话。金大中事件并不只给韩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难道它不是在国际舞台上暴露了日本政治的真相吗？应该说，随着朴政权的迅速没落，日本政府的内幕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看来，日本的执政者是根本不考虑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国际上受尊敬的国家的鼠目寸光的人。

最近，各家报纸零零碎碎地开始报道了这样那样的消息。对于为支持金芝河等民主人士并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而从日本和美国来到韩国的五名外国人的消息也报道了一些。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现在，国民所关心的，不是大

字标题的文章， 而是这种小消息。 因为这里才有事实的真相，也可以从中得到鼓舞。

不管怎样， 报纸上出现这种消息， 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许可以说镇压也泄了点气，因而言论界也随之逐渐抬起头来了。只要是有一点批判精神的报纸，就窥伺这种机会。假如这些现象得到助长，那么就会又抛出特别措施之类的炸弹。实际上，韩国的官吏和搜查机关是只有在上司厉声吆喝的时候才行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工作的正当性。上司的喝叱声稍有停顿，他们就向民众求饶，并协助民众。这也可能是最近言论界稍显活跃的一个原因。

韩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文章大费脑筋。中央情报部拼命地寻查给外国报纸提供材料的人。尽管如此，有许多韩国人冒着危险，同外国新闻记者见面，提供许多消息，诉说自己的痛苦。他们还很想看到刊登这一类消息的报纸。如果把这种消息从报纸上剪下来送给他们，这将是他们最喜欢的礼物。他们不但自己看，还给朋友们传看。有一个朋友看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后对我说。

“我很想给朋友们看。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 如果大家知道争取韩国民主化的斗争这样博得国际上的赞扬，那末他们就会抱着更坚强的斗志，纷纷投入斗争队伍中来。”

他是某家报社的要职人物。但据说他从未看到过外国报纸批评朴政权的文章。报社里有不受中央情报部监督的科室。据说，报社的这一科室要职人员能看到一般国民不能看的有关北朝鲜的图书。近来，这个科室几乎无限制地收

到共产主义图书，但批评政府的书籍和新闻报道却根本不能收到。我问是否接到《世界》杂志。回答说，从去年十月起一本也没有接到。至于日本报纸，他们原来是涂上墨汁后分发的。但近来，文章篇幅增大了，所以往往把有关版面全部撕掉。结果弄成了内容空洞的报纸。他慨叹着说：

“我们已经很久以来不写日记了。因为写日记被逮捕的例子很多。我们得烧掉书信和文件，有时还要烧掉图书。这样一来，很难研究日本统治时期的东西。手里既没有象样的日记，也没有资料。如果将来要写今天的历史，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搜集韩国的史料，将不得不到外国去。……”

我给他看了随身携带的《世界》杂志。他在看到一篇题为“绑架金大中事件”的文章时说，“原来外国是这样做的，我根本不知道。”他还说，“这是宝贵的资料。应该根据这个资料重新设想朴政权的末路。”为了了解这个黑暗的现代史的真相，将来我国学者不得不到日本去搜集“证言”和“资料”。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不禁感到沉重了。

最后，我要谈一谈昨天有一个学生运动领导人找我来讲的话。据他说，现在被捕的人数大大超过已公开的人数。将近百分之六十的领导人坐牢，剩下的百分之四十的人当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已经躲避了，但当局正在搜查；还有大约百分之十的人也因为感到危险而躲避了。现在还算安全的人有百分之十五。

当然，在所谓身边安全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从早就被当局注视的，因而他们常常被带走，受监视。据传闻，

不久可能还有一次大规模搜捕。在目前的情况下，幸免被捕，可算是偶然的事。逮捕或囚禁，并没有什么标准。只要上面刮起一阵风，大喊一声“押起来”，那末无论是谁都会被捕。如果说一句“别管那个家伙”，那你就会暂时保险。

四月三日以来的逮捕可算是彻底的逮捕。不仅公开活动的人，而且在幕后活动的人也全都被捕了。因此，领导核心都在坐牢。那些躲藏的人，目前同外部的接触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中央情报部执拗地进行着搜查，许多人的行动比以前显得更谨慎了，但是基督教青年学生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或杀害了。他说，表面上看来，朴政权干得十分愚蠢，其实，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周密细致的计划进行的。一切计划都是在一个月以前拟好的。他露出悲观的神色。在座的另一位朋友对他强调说，朴政权在国际上已经陷于孤立，革命的时机正在成熟。他说：

“……朴政权在世界上已经被孤立了。这种情况下，这一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实在无法维持下去。怎么熬过今年的冬天，就是个问题。如今，从燃料荒开始，实际上面临着危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的角度上看，政府的措施也只不过是一般性的救急措施和弥补措施。”

为了使朴政权崩溃，难道我们竟期望国民经济的破产吗？当我想到，民众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够抵抗朴政权暴压政治的办法而沉于苦闷，不禁心如刀割。这些青年的脸上笼罩着深沉的苦闷。

油灯底下倒黑暗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讯

朴政权指望世界舆论闭眼不看，闭口不语。他们认为国内已经彻底控制住了，但是国外舆论还成问题。他对美国政府不敢这样说，但是对日本常常说不要干涉内政。把日本报纸报道韩国国民因批判朴政权而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也说成是干涉内政。朴政权叫嚷说，对本国国民怎样处理，与你有何相干。

我在这里感觉到了强盗的逻辑。上月月底有过这样一件事：警察奇袭武装强盗的家，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时，强盗把自己的妻儿做挡箭牌，拿着武器抵抗警察。警察发现强盗企图自杀，就劝他说不要杀害你的妻儿，但他却说："都是我的家属，管你什么事。"这样终于闹出了流血惨案，把自己的妻儿全都给杀害了。朴政权的逻辑同这个强盗的逻辑真是如出一辙。

要想使世界舆论对朴政权沉默不语，就必须在其他地区发生足以吸引世界耳目的世界性事件。应该说，中东的纠纷、塞浦路斯的政变，使朴政权喜出望外，吁了一口气。特别是军部掌握政权，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十分高兴的消息。他们盼望归于民政的泰国或葡萄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朴政权也是个从根本上反对和

平的政权。他不仅叫嚷什么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且期望不幸和混乱席卷世界。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意识。

然而，塞浦路斯的政变归于失败，希腊出现了民政。这对朴政权来说是一件最不愉快的消息。相反，它鼓舞了韩国的民众。报纸上刊登了欢喜若狂的雅典民众的照片，还加了这样的标题：

“法西斯主义宣告灭亡”

“军政告了终，……这一喜悦用什么来比拟呢！”

“企图把国民的视听转向别处的军政遭到沉重失败”

“反独裁战士们陆续回国”

特别是一位观察家为祝贺希腊恢复民主而写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博得了许多人的深切共感。

文章说：攀登阿克洛保里斯山岗，俯瞰雅典市，可以望得见北方的黎卡皮托斯。希腊的气候风土近似韩国，甚至松树的枝叶也不知怎的很象韩国的松树。从这里往议事堂方向走下去，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铜象，再往下走一走，就有拜伦的铜象，它好象向全场听众吐露激昂的雄辩似地巍然屹立。有句俗语：“剑锋抵不过笔锋”。在孟加拉出现了拉赫曼，在巴基斯坦出现了布托，在希腊出现了卡拉曼利斯。下一次，在什么地方将出现什么样的人物呢？

报社的人们常说，近来，应该掌握能够往通得过的文章里，写进想写的内容的技巧。这就是韩国的言论自由。对现实情况的这种适应，决不是容易的。他们说在这方面谁也还没有得到成功，但是可以说上面的短评是比较成功的了。

朴正熙对美国的水闸事件的想法，恐怕是很错杂的。

在美国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专心致志的情况下，他是能够避开美国的注目任意行动的。他认为水门事件，是有利于他苟延残喘的事件。然而，朴正熙对韩国的自由主义者借攻击尼克松的语言影射朴正熙本人，不能不感到焦虑不安。他指使中央情报部在全国各地到处部署了偷听组织。因为金大中曾是他的敌手，至今仍然折腾着他。权力的非道德性、非正直性和腐败性达到了顶点。尽管如此，他仍然梦想永久执政，对年轻人宣判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

尼克松总统的辞职，给朴政权带来了一种恐惧。因为他认为这个事件会给韩国国民以莫大的刺激。韩国的各家报纸在第一版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尼克松的辞职演说。“要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伟大的权力也在法律面前屈膝了”，“总统也不可能超越法律”，“对没有品位的政治的警钟”这些标题，分明是针对朴正熙的。这是他们要反映韩国民众的深切愿望的。他们虽然不能谈论朴正熙的辞职问题，但可以大谈尼克松的辞职问题。也就是说，韩国的许多知识界人士借谈论尼克松的辞职，来吐露了自己内心的郁愤。

那些要求审判当权者的人比腐败的当权者，是崇高精神的所有者。然而在韩国，具有崇高的忘我精神的人，却遭受着腐败的暴力的审判。我还记得曾参加一次学生集会时目睹的情景。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可是一到深夜，这些年轻人都想起狱中同志，就沉默了。他们为了鼓励自己，都站了起来，同在场的一位前辈教授并肩唱起歌来了。不久，歌声变成了哭泣声，再也不能继续唱下去。真是生在

不幸国度的不幸的年轻人们啊！

和这些年轻人相比，统治者实在是肮脏透顶的党羽。目前，韩国的知识分子常用"油灯底下倒黑暗"的俗语来嘲讽自己。意思就是说，身在韩国不了解韩国的情况，而外国倒更熟悉韩国的情况。这又是说，在朴正熙这个"伟大的油灯"底下，韩国沉浸在阴森可怖的黑暗中。有一位言论界人士慨叹着说，实际上，目前在韩国享受自由的人只有一个，而在他下面的黑暗世界里，人们只习惯于驯服。他谈到这种情况时说：

在统治者的命令面前，人们没有力量抗拒，只好服从。还为了迎合他们的脾胃，自己寻找着服从的道路。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倚势仗势。真是道地的奴隶。

在韩国，越是上层人物，越看上级的脸色行事，不管国民是怎么看。外交官也象鹦鹉，一味重弹中央情报部的命令，但是，这些官员也见到知心朋友，特别是将来朴正熙垮台后能捞到一些势力的人，就谈自己的身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

有些人说："不通情理的世道里能作些什么呢？"也有些卑鄙的高级官员辩解道："曾提出辞退这一官职，可是中央情报部就来搜查住宅，真没法子。"他们明知自己背叛国民和民族，却不知羞耻地说，为了糊口，别无办法。他们虽然这样说，但是为了升官发财，就毫无顾忌地干出卑鄙的勾当。在目前的情况下，倚仗朴政权的人，都是这

一类的人。当权阶层的腐败真相，实在目不忍睹。这种污泥浊水正在蔓延全国。

在国外开会的时候，往往中央情报部人员夹在韩国代表团里参加会议。因此，韩国代表的发言自然要受中央情报部的监督。不仅如此，他们考虑自己的发言会通过中央情报部人员汇报上级，就作有益于升官取宠的发言。不是为同外国代表讨论问题而发言，而是为向韩国的上级呈上报告而发言。他们要是同日本人进行对话，就采取强硬的态度，说“对于两名日本人学生事件，日本政府应该向我国道歉。”因为他们长官已有指示，只要对日本人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就会做出让步。有一个由参加国际会议回来的朋友对我说：

“上面的头子疯了，下面的人随着全都疯了。要是有良心的人，怎么能对金大中事件或两名日本人学生事件采取那样厚颜无耻的态度呢？应该说‘很抱歉，请稍等一等’才是。”

他说，有些人对韩国政府给早川和太刀川判处二十年徒刑的事并不感到丢脸，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还对在日本看到的韩国政府的“糊涂”说：

“他们对待日本人如此无理，但在日本报纸上却大量刊登招邀观光客人的广告。他们认为只要缴大笔广告费，日本人就喜欢他们。这就是朴政权的思考方式，这就是他的对日观点。在国际会议上说一大堆只有中央情报部和朴正熙喜欢而日本人连理都不理的谰言，认为这就打扁了人

家，然后装出凯旋将军的姿态欣然自得地回国。朴政权可能称赞这就是出色的国际外交。”

这的确是错误的。朴政权在自己的权力周围只留下了这类人。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来聚集在他的周围的尽是这种人。那些对此感到厌烦的人就离开了他。有良心的人逐渐采取批判的态度。被统治者比统治者更高尚更爱国的理由就在这里。因此，我想只要革命成功，精神上更高尚的时代就会到来。这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历史的前进。那位朋友听到我的这种见解后说：

“朴政权完全弄脏了这个社会。这就是朴政权的最大的罪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医治的病。”

我也同意了他的见解。我认为，事态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就要为了民族，尽早给朴政权敲响丧钟。

剥 夺 灵 魂 的 作 战

现在，韩国正在大搞“剥夺灵魂的作战”。在离汉城不远的水原进行“新村庄训练”。有一位前辈说：“这简直就是日本统治末期搞的‘祓禊’。”（译者注：为灌输法西斯思想而强行的精神锻炼活动）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训练期间，不允许与外界接触，从早到晚进行训练。讲课的内容主要是“新村庄精神”。训练是从早晨的跑步开始的。被迫参加训练的有长官，也有学界、金融界和言论界的要人。训练逐步

扩大到青年，据说还准备训练几十万青年。因此，人们说这是剥夺国民灵魂的计划。这就是说，国民训练也作为统治手段出现了。因为不剥夺国民的灵魂和本来的机能，就不能进行统治。

大学也被剥夺了灵魂。他们还疯狂地企图剥夺宗教的灵魂，国会的职能和灵魂也完全被剥夺了。然而，对朴正熙来说，连这个处于濒死状态的国会也是一个危险的存在。（代表在野党的议员在国会议员总数中所占的比率不到四分之一）国会在韩国宪政上持续了最长期的冻眠状态。这个国会经过二百二十六天才召开了为期十天的会议。但是因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闹对立，只开成了三天。这是因为执政党方面威胁说，虽是在国会，只要批判总统紧急措施，就会被逮捕和囚禁。

执政党和在野党好容易才取得一致意见，召开了国会。但是在野党只提出了如下提案："要尽快取消总统紧急措施，其具体理由将用口头叙述。"由于执政党的"命令"，在对这个问题的质问讨论中，强硬派议员们全被排除掉了。一些在野党议员吐露自己郁愤的心情说，他们举着白旗向执政党屈服了。有人还说："我原想豁出一条命登上讲台发言，可是得不到发言的机会了。""受人欺侮而活，不如英勇就义。"

金总理在国会上的答辩，清楚地暴露了朴政权是何等虚伪的政权。下面要不加评论地列举他的答辩中的一些无稽滥调。

"我国确实是民主国家，民主不会变质。……虽然有一

些限制，但没有和其他先进民主国家根本的不同之处。”

“这些日子里政府向共和党传达了自己的意见， 还是召开国会为好。可是没有开成，可能是因为执政党和在野党没有磋商好。”

“一些外国言论界人士说韩国有拷问， 但是我肯定地说连一件也没有。”

“国民的团结所以往往遭到破坏， 是因为那些博识之士言词过多的缘故。”

“由于对韩国认识不足或有误解， 外国人有时批评我们。但是我并不认为因为采取了紧急措施，才使国家威信扫地。”

“有些人担心韩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但是不能那么轻易地被孤立。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吵吵嚷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责难韩国的。”

“除了禁止订购日本的一两家报纸外， 没有指示剪报纸的事。经过调查之后，如有这种现象，就要加以纠正。”

“不可能人为地捏造出犯罪案件。 有人说金芝河由于搞了文学活动而成了审讯对象， 但是， 不管他写了什么样的诗，我们从来没有借他的文学活动而把他当做审讯对象。……”

“就拿金大中事件而言，……在日本，有些人说我们违反了谅解事项。可是我认为这是出自他们的误解或者日本自身的某种情况的。我们没有做违背诺言的事。”

“我认为， 言论界自律地考虑到我们的现实，发挥有见识的言论。”

“我们清楚地知道最近旅美侨胞有所动摇。 看来自从北韩在联合国设了办事处以后，北韩工作员进行渗透，侵蚀美国东部，进而伸向西部地区。”

法西斯主义者会随机应变地改变主张，只要把伤脑筋的事蒙混过关就行了。结果弄得毛病越来越严重。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批判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个星期以前，金钟泌说，“今后六年内不能实行民主”，而现在，他却胡说什么“这就是传统的民主”。他说没有一件拷问的事。这是多么厚颜无耻啊!“饱受了二十天的电刑。”“因为中央情报部不让睡觉，无法忍受，才照着他们所读的内容写了。”“因为在被带到中央情报部以前就被打得身不由己，所以从那以后就不能进行正常的口述了。”难道学生们在军事法庭上叙述的这种证言都是假的吗?

如果说，金钟泌说的话是真的，那末为什么不能公开审判呢?为什么不允许国会议员调查拷问情形呢?为什么不仅不允许旁听对年轻弟兄的审判，而且对旁听过的家眷的动态进行那样严密的监视呢?

现在介绍一件同拷问者的这种卑鄙精神截然不同的、被拷问者的富于幽默的事实。一个外国人教授会见了一个因小小事件而被捕受尽严刑拷打的学生。学生的身上留着明显的被拷打的疤痕。这个外国人一时没能找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安慰他。只是喃喃地说道:“可怕的事情。”这时学生回答说:

“我是农民的儿子。如果我在家里， 说不定我爹可能

把我打得比这还厉害哩。先生，请您不要担心。”说罢就跑步走了。教授说，他望着这个学生的背影，不禁感到心如刀割。韩国青年遭受的这种苦难，难道说是毫无意义的吗？这位教授会见了一位在野党的元老，这位元老表示希望，外国人能够在如下几个方面支援那些为争取民主和人权而进行斗争的韩国人：首先要为对无数学生的支援和法庭斗争提供财政上的援助；要为他们祷告和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要派调查团予以鼓励；要努力使外国报纸报道真实情况；要把能够说出真实情况的韩国人请到外国去进行谈话等等。我也这样想。

为帮助无数学生的法庭斗争而请律师也有困难。因为施加压力，律师不得不在中途退缩。因此，人们说需要找一些敢于牺牲的年老的律师。当然，迄今还不能如数支付律师费。

随着这一斗争持续下去，这些问题就更迫切了。国内也需要支援，但是如果被中央情报部发觉，就会被当做共谋犯处理，所以很困难。有一位教授吐露他最近的遭遇说：

“我的背后有一个警察和一个中央情报部特务在钉梢。还有一个我的大学后辈，是个国会议员，他担当着说服我的角色。可是，最近我说些批评和责难的话，他也不反对，反而表示同情。可以说人们的内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职责上有所区别罢了。如果上司一说，今天给我逮捕那个家伙，那末我也就要受十五年、二十年的徒刑了。”

类似这位教授的人都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因此，他

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外国人到韩国来谈话，而不要担心这样做就会给他们带来灾祸。不论是坐牢的人还是在狱外斗争的人， 都认为只要朴政权不垮台， 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一样的。而且得不到胜利，现在的痛苦就会归于泡影。这是为了争取胜利而自愿领受的痛苦，因此决不愿意为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放弃胜利。他还继续说：

“我很想同更多的外国朋友见面。 因为我想要弄清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并诉说我们的痛苦。现在正是做好一切思想准备，用宗教式的信念去进行斗争的时候。”

他还说：独裁者企图一个人专横一辈子，但是民众却不断交替斗争队伍进行斗争。独裁者只要他一个人伤亡就算完了，但是民众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编成新的队伍派往战场。虽然现在有很多学生在遭殃，但一到今秋或者明春，就会有新的热情充沛的年轻人组成更强大的队 伍 投 入 斗争。 就算胜利在几个月后就要到来， 但我却感到太遥远了。因为虽然身在狱外，但实在不堪忍受这种暴力镇压和痛苦。

囚 犯 的 话

八日在军事法庭，又有二十六名以违反紧急措施和反共法的罪名被判处了徒刑。其中，被判十五年徒刑的有二名，十年徒刑的有五名，八年徒刑的有二名，七年徒刑的

有十二名，五年徒刑的有二名，三年徒刑的有三名。十二日，有十三名青年以违反紧急措施的罪名被判处了徒刑。其中，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有一名，十五年徒刑的有四名，十二年徒刑的有二名，十年徒刑的有六名。主教池学淳、牧师朴炯圭和延世大学教授（任教美国史）金东吉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延世大学神学系主任金灿国被判处十年徒刑。只有前总统尹谱善被判处三年徒刑和五年缓刑。十三日又有三十六名以违反紧急措施和准备内乱阴谋的罪名被判处了徒刑，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一名，十五年徒刑的有十三名，十二年徒刑的有二十名，十年徒刑的有二名。这样的大批重刑宣判接连不断。有说是近代化伴随大量化的，那末可不可以说朴政权就是在被告的数目和定刑的程度上正在实现近代化和大量化呢。

天主教主教池学淳的被捕事件真是富于戏剧性的。有八百名教徒拦住了逮走池主教的汽车。结果对池主教的审判只好无限期延期了。在这以前，朴正熙总统也对金红衣主教担保说，他一定从善处理池主教的事件。但是，教徒们走散了以后，他们就把池主教带走了。这为的是他们要显示，政府的暴力能够挫折象"良心宣言"那样的拒绝非法审判的任何抵抗。据说，因为这个缘故，池主教饱受了相当的拷问。天主教教徒中间，迄今有过稳健派和强硬派，而池主教事件把这两个派合而为一了。在这以前，即七月五日，韩国的天主教主教团宣布今年为圣年，并宣誓"要竭尽全力按照基督的理念，使所有的人都恢复其本来的尊严，摧毁一切对人的差别、虚伪和不信任的障壁，人人共

同学爱兄弟的爱和和平。”可以说，天主教教徒的觉醒和斗争在韩国也已经开始了。

军法会议发表说，池主教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法院特意宽大为怀，宣告我无罪，那末， 我将情愿缄口无言，专心致志地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帮助可怜的人们。”

这种捏造是军事审判惯用的手法。这是他们企图使人们感到通过“良心宣言”表现出来的池主教的刚毅性已被挫折，从而抹煞民众对他的幻想。因此，我们有必要得知秘密传出来的池主教的话。他在谈到他同金芝河的关系时说道：

“金芝河原是肺结核患者， 他受尽严刑拷打后来到了我身边。真是一只可怜的羔羊。而且始终受警察的钉梢。容纳被遗弃的人是主教的任务。他是天主教教徒。”

就支援学生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我反对暴力革命。我支持了学生的和平示威。 我的用意在于要让政府倾听正当的批判。”

前总统尹潽善在法庭上被求刑后所说的话，也是充满爱国精神的。他质问说，给两个日本学生提供的五千五百圆怎能成为革命资金呢？他毅然说，只要是能够为了爱国学生， 他就欣然替他们受刑， 献出自己年近八十的一条命。可见这是要为以人权和正义为基础的民主而献出自己余生的崇高精神。应该说，身老而志气高昂。对于他们的这种精神，金钟泌却对外国记者说，他们 “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勾结了共产主义者操纵的反政府阴谋的。”这是多

么卑鄙而厚颜无耻的滥调啊， 金钟泌说， 尹谱善、金芝河、池学淳他们都是为了实现野心而行动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一心为祖国着想的。

其实，八月二H，基督教方面举行集会，各教派的代表和元老等十一人签名并发出呼吁要求废除紧急措施，恢复民主，要求在八月十五日光复节那天全部释放以违反紧急措施罪名被捕的学生和牧师。中央情报部的特务可能在会场外，偷偷地录下了音，要求他们立即交出呼吁书的原文。 八月五日， 代表同金总理会面时只谈了呼吁书的内容，并没有交出准备提交总统的这份呼吁书。据说金总理对提交呼吁书的问题请求他们等到月底。但他们不顾金总理和中央情报部的劝告，十三日就把这份文件提交了青瓦台。这就惹起了中央情报部的愤怒。因此，在教会领导者中间笼罩着一种不安的空气。但是另一方面，广泛传开了一条风闻，说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紧急措施不久就会被撤销。

反正可以说，胜利的日子，日益逼近。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的洪流。据说，在日本，人们为了声援在韩国被囚禁的人们，甚至进行着绝食斗争，日本的新闻出版界也恢复了勇气。韩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胜利的那天，我们同世界有良心的人们一起举杯庆祝这一胜利。

这一胜利、这一自由，将是同甘共苦进行斗争的我们大家的共同所有。在韩国的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

应该再说一句。如果这一斗争和胜利属于共同所有，

那末，韩国的民主重建也应该成为共同事业。民主建设的道路、南北对话和统一的道路，这是一条艰险的道路。希望在这艰苦的斗争中，也要大家步调一致，又有鼓励，又有批评，又有对话和讨论，也希望参与这一斗争。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把日本、韩国、亚洲看做是共同所有、共同负责、共同前进的阶段。

可 悲 的 事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七日讯

八月十五日，朴总统夫人在光复节纪念会场上被人杀害了。这是一件很大的冲击。各家报纸、电视台争先恐后地纷纷报道这一冲击性事件。

但是，韩国这个国家一向是只允许发表一方面的话的，这对这次事件也不例外。大多数国民象囚犯一样被禁止了说话。只有那些决心被判处死刑的人，才能交换“流言蜚语”。那么，这些人是怎样对待这一事件的呢？

对于死，人们不能不抱有肃然而悲哀之感。然而，不知为什么，有些人并不抱有这种感受。我认为政治性的死的悲哀，就在这里。

对被杀害的夫人高声谈论的人当中，对朴政权抱有批判的态度的人是几乎没有的。对前总统尹潽善已被判处缓刑，可以说审案早已结束了。但是中央情报部的特务却盘

据在尹氏之家，从外部挂来的电话都由他们来接，也不允许尹氏同妹妹和女儿相会。据说，中央情报部的特务对前总统尹潽善说，常挂来恐吓电话，说要杀害他。这是真的吗？要是真的，那么可以说韩国简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不仅是现任总统和高级官员，甚至那些批评政府的在野党人士也要时常受到威胁。事实不正是表明靠紧急措施进行统治的地方，就是没有宪法、没有政治、没有法律的天下吗？

对总统夫人的被杀，人们本应该表示深切的同情，可是老实说人们却把这一事件看成是韩国的这种形势本身所招致的必然结果。虽然是冲击，但也是早已预感到的事。认为永久一人独裁是不好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应该找出恢复民主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却被堵塞了。同时，披着紧急措施这一“合法”外衣的、简直比个人恐怖可怕得多的暴力之下，有良心的人们接连遭到牺牲。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最有见识的人们也毫无顾忌地私下议论，除了恐怖手段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不过，因为理智地考虑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损失和反动攻势，才不去付诸实现罢了。所以，射击犯是旅日韩国人这一点特别令人惊奇。在对两个女人的不幸之死表示哀悼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这一冷酷的事实。

有个朋友说“朴正熙的命根怪结实。”另一个朋友却回答说“不，折磨他的复仇之神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他。”有人说，搞民主革命，决不应该采用恐怖手段，而另一个人却说革命本身就包含着暴力。我以忧郁的心情倾听他们的

议论，感到如果没有对这种形势的把握和由此而来的根本上的转变，那末朴政权所走的泥泞之路将越陷越深。然而，朴政权连夫人之死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于苟延残喘。于是，所有的电视广播大量播出“伟大的国母”的故事。对这种令人作呕的宣传感到恶心的人也不是很少的。把她一会儿说成“国母”，一会儿说成“青瓦台的在野党”，对此我也受不了。

有人问，朴正熙是否将会变得更加残暴。但我是想，他怎样对付今天他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将在秋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当然他会接到外国的唁电，但这无非是一件可耻的事。他将会变得更加残暴，梦想作“大王”的野心将会越来越大。但是，这到底是可能的吗？有人说，顽固分子对自我防御是很有办法的：把别人当作敌人看待，采取残忍的姿态。朴正熙在国际上被孤立，在国内处于不安状态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自身防御的某种姿态。但是，朴正熙及其政权的偏执只能越来越加深而决不会有所悔改。这一悲剧将一直演到民众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对于土崩瓦解的政权来说，它就象制动器发生故障的汽车走下坡路一样，任何一个事件都只能促进它的没落。有一个执政党系统的实业家对我说：

“人们对坐上高级轿车，摆出官架子的人必恭必敬，这就是今天的体统。国民陷入了无可收拾的混乱的心理状态。不安情绪将越来越加深。……”

他还提供了两件内部消息。

“据说，一些高级军官去见美国大使说，我们也不能

再沉默了。中央情报部出动全副人马在查寻这些人，可是还没有找到。”

“据说，最受朴总统信任的朴警护室长有一个朋友是个政府高级官员，他向这个警护室长说，你不是可以向总统照实地说明国际动向吗？他回答说，那样做我的脑袋也会保不住。总统完全被孤立了。人们避开他的眼神，惶恐不安，适当地迎合着他。”

韩国人对政治灾难绝不是听天由命的。在朴政权之下的今天更是如此。所以，各种流言蜚语成为民众的语言，很快地传开。诸如，已故的夫人打过情架之后，暂时到娘家去住了；在光复节这样重要的节日那天，金钟泌为度假而不在汉城，也是个奇怪的事情；据说夫人被击中两发子弹，这是个难解的事，大概是政权内部的纠葛吧，等等。这类流言蜚语可能不符合事实。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道出了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朴政权成了如此被人们不信任的对象。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正因为这样，这一事件不是作为刑事案件来搜查，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尽管同金大中事件有不同的内容，但也同那一事件一样，可能会处理得不了了之。也可能把责任转嫁于北朝鲜，也可能利用于对日关系上。也可能把金大中拉进这一事件中去。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击中女学生的子弹是谁发射的。对他们来说，这一事件，与其考虑无辜死亡的人的生命，倒不如把它用来作朴政权苟延残喘的手段。这样做能带来好的结果吗？国民对政府的

这种作法表示冷淡。

这样做了，夫人已死，不幸将更加加深。所以，我们韩国人的悲哀将越来越加深。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四年第十期）

可 悲 的 证 言

韩国通讯　　　　T•K

母 亲 的 祷 告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讯

丽日青空、"天高马肥"的秋天又来到了。不知为什么，每年一到秋天，韩国人的心总是沉入悲伤之中。然而，讲清其理由的人却是没有的。是那碧蓝碧蓝的天空诱人哀伤，还是因为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是去扫墓祭祖的日子？今年九月三十日便是中秋节。

在那蔚蓝的碧空下熟透的柿子累累欲坠，村庄那边的土岗上，身着白衣的人们一簇簇聚在坟墓前，看到这种光景，不由得一股悲伤涌上心头。

"哀呼，哀哉……"女人的痛哭声远远消散在蔚蓝的天际。我的脑子里忽然想到，天空所以那么蔚蓝，是不是因为它吞噬了这悲痛的哭泣声。怒放的波斯菊也在引人悲伤。

为什么这样感到悲痛呢？或许他们在回想已经与世长辞的人，回顾苦难重重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和自己的过去，而沉入悲伤之中，也许是因为他们身作一名平凡的百姓，心里涌现出一股酸水，一再哀叹自己"充满怨恨"的一生，

还是因为触景生情，自然的风景越发美丽，就越发感到我们现实的苦难和人生的痛苦。也可能是因为眼看万物冰结的寒冬逼近，就联想到人生的虚霍的吧。

如今韩国的年轻人站在秋空下，眺望那树叶开始泛红的山峦，倾听那潺潺的溪水声，喜欢唱这样的一支歌：

冰冻的天空，冻结的大地，
太阳失去了光彩，啊，黑暗笼罩着
贫穷、受折磨的大街。
你从何处来，面孔黄瘦的人，
你那双眼，那双干瘪的手，在寻找什么？
啊，那条大街，荒凉的大街。

被拒绝的人手，啊，黑暗笼罩着受辱的大街，
天国啊，你到底在哪里，
九泉之国，
啊，你就在那里，在那青翠的树海。

他们哼着这支歌，为争取自由投入斗争。九月二十二日，为了拯救被监禁的人，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新旧基督教联合祷告会。会序上用大字写着："为了祖国，为了恢复正义和民主，同狱中受苦受难的池学淳主教、朴炯圭牧师以及许多圣职者、基督教徒、教授、学生、律师和作家们一起，举行这次祷告会。"

这种集会当然不会得到中央情报部的许可。天主教负

责人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主张现在还不是新旧基督教举行联合礼拜的时候。说教也被禁止了。于是决定取消一切会序，只作弥撒。但是年轻的牧师和神父都表示了反对。这样， 正在进行弥撒的途中突然在会序里加进了“被监禁学生的母亲的祷告”。 由于进行这番祷告， 大大激动了人心，集会参加者都流下了眼泪。

作祷告的女人是有两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的基督教徒。据说她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有点痴呆，离家后一直下落不明。 这个女人说，过去她只为自己的儿子着想， 可是发生这次事件后能够为全体狱中的年轻人着想，为他们祷告，真是不胜感激。这与其说是祷告，倒不如说是抗议和呼吁。下面援引这个女人祷告的一段。

……自从我们心爱的孩子们被关进监狱后，不觉已过去春夏两季，到了风凄月冷的秋天。中秋前夕，我们作母亲的禁不住悲伤和流泪，抑制不住这股痛苦心情，有时信步游山，有时仰望着上帝哭泣，有时通宵跪坐在上帝面前流泪控诉。……

他们根本没有把个人的安逸和幸福放在心里。他们真心热爱左右邻人。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夜校里给延喜洞贫民的孩子教书，有的把圣经教给卖报的孩子，宽慰他们，成了他们的朋友，为孤儿作朋友，为他们效劳。他们遵照上帝的教诲，一心想正直地生活，憎恨不义，辨别真理和虚伪，并把上帝的鸿爱传给这个人间。听说今天他们在狱中互相传达上帝的教诲，一块干粮也要分着吃，为此我衷心感谢上帝。

上帝保佑，请你怜悯黄寅成君的母亲吧。她在乡下，被诬为赤色分子，冤枉之余，想过自尽；愿上帝怜悯金景南君的母亲吧，她卖短工供养孩子们，请帮助她吧；上帝啊，金永俊君的母亲终于没有见到儿子就与世长辞了。听说，她的儿子伤心流泪， 整整五天没有咽下一口饭。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母亲饱受着痛苦。

……风天雨夜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就不能入睡；走路时遇到他们亲密的朋友，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每当坐在饭桌前时怎么能不想起他们呢。……

上帝，愿你怜悯这个国度这个民族吧，请你饶恕我过去只想给我的孩子吃好穿好的罪过吧。……请饶恕我吧，我曾梦想我的孩子能够象世人所盼望的那样升官发财；请饶恕我吧，我曾看到许多贫穷的邻居，也不去亲近而避开了他们。到了今天，我才通过心爱的孩子们懂得了上帝对我们母亲要求的是什么，那就是要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别人的孩子。……

目前，在我国疆土上信仰也变得如此深刻。

常言说“乱世出好汉”，朴政权的暴政造就着伟大的母亲。她们虽然是少数，但具有历史意义。天主教徒中间有一个“为和平而战的年轻神父”的组织。他们在抗争中寻找教会前进的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所有电话都被偷听，信笺被检查。但是民众当中流传着一条风闻，说再过一两个月，这黑暗的时代就会告终。

随着秋天的到来，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国民的情绪

更加激励着抗争。也许受了这种环境影响，一个教会领导人讲述他们教会信徒大会的情况说：

“大会宣布狱中的人饱受和耶稣一样的痛苦， 并大声疾呼要恢复民主体制。会上大家都做到了畅所欲言。虽然有亲政府派， 但被这种空气所压倒， 全场一致通过了声明。神学院学生都削发参加了会，吸引了大会的注目。虽然当局竭力禁止签名请愿释放被监禁的学生，但是，看来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签名。即使威胁说要处死，她们也不会倒退。”

这可以说是今天全体国民共同的情绪。中央情报部害怕天主教徒越来越积极进行斗争。他们以为借病保释池学淳主教和金芝河，天主教徒就会镇静下来。但是他们两个人对转告这条消息的一位主教态度坚决地说：

“你说什么，要单把我们两个人借病保释吗？ 其实我们正在考虑，如当局真的释放所有狱中的人时，我们是不是要走出牢门的问题。我们若是不喜欢坐牢，就会老老实实地呆着不进行任何活动了。

“可以说， 我们是为了争取民主胜利而自动走进监狱的。”

反 日 创 伤

“八•一五惨案”后发生的反日运动受了不少创伤。

朴总统接见一个外国新闻记者时，在决不公开的条件

下，阐明了自己的"信条"。这里只叙述我所听到的内容中的四件事。

首先，他说他在这次反日示威时真想断绝同日本的邦交。朴正熙说就是燃起战火也在所不辞。更有趣的是，他甚至说什么要是和日本打起仗来，打短期是有把握打赢的。虽然田中首相来找朴正熙，但看来朴正熙很不愉快地对待了他。

撇开朴正熙本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日感情，就无法理解这次反日运动的本质。这甚至令人感到他的狂症发作了，他杀害夫人的遗恨就该这样向日本发泄吗？是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政治家啊。

记者问道，对福特总统访问韩国有什么想法，他是不是应韩国的邀请来访问的？朴正熙回答说这是尼克松总统时期决定的，而不是韩国邀请的，只要访问日本，就照例要到韩国的。朴正熙还说，福特访问韩国是根据美国的需要的。同韩国的需要是毫无关系的。看来，朴正熙断定美国已经不再支持他的政权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金钟泌责难那些批判朴政权的美国人说是"似是而非"的言论界人士，是"似是而非"的政治家。朴正熙也攻击那些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人说他们是丧失了主体的事大主义者。

其次，他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说，美国停止军事、经济援助也将不去过问。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援助对朴正熙成为威胁，那末，干脆没有这种援助，倒对维持政权更有利。然而朴正熙又回答说，美国的援助不是为韩国，而是为美国本身的，所以美国不会停止对韩国的援

助。

最后，记者提出了有关释放狱中政治犯的问题。朴的反应是，为什么要释放他们？记者再次问道，传说在福特总统访韩以前他们会得到释放，你有何打算。

朴正熙回答说，福特总统访问韩国和释放学生和宗教徒的问题是两回事，我没有释放的意思。

朴正熙的这种回答似乎反映了某种绝望的心情。

尽管如此，现在人们议论着在福特总统访韩之前，会有什么措施。即使释放了，不是可以软禁吗？必要时中央情报部不是可以押走或重新监禁吗？就是释放了，那也不过是临时搪塞而已。被监禁的人的家属们焦虑不安地想到是不是外面不稳定，他们就不能出狱。他们的这种推测是出于这种想法的：政府很怕，如果外面动荡不安，把他们释放出来，就必然会汇合成更大的势力。

有些人还担心政治犯的释放只能成为欢迎福特的礼物，而基本问题却得不到任何解决。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朴总统会和缓自己的态度。但是他用恐吓的方法是无法阻挡抗争者的抗议的。近来，抗争者们似乎也看清了敌人的力量，都满怀着信心。

九月十八日，经过一番部分内阁成员的更换，新人物上台了。据说，他们当中有人对这种“飞黄腾达”并不表示欢迎。他们很顾忌接受新任务。有的人还苦心想过辞退。甚至受过威胁说不接受就不会有好结果。直到现在为某种原因同朴政权结成关系的人在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背叛他说一个“不”字的。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究竟想怎样来维持

自己的权力呢？有些人推测，由于这次内阁成员的更换，金钟泌一伙的人下了台，使他变得更孤立无援了。一位新闻记者对我说：

“金钟泌在这次举行反日示威时，虽然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动，但对他却献媚效忠。然而，应当看到这里反映出了他的孤立才对。这次，金东祚外务部长官立下了特大功。朴正熙每当干出鲁钝的勾当时总是拿愚钝的人作前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让他感到这个世道是他的天下，并待他如同无价之宝，而特别器重他。

“这次，外务部金长官的所为就是一例。每每他那外交官式的‘毫无修饰的感情’成了问题，可是现在却为此而得到了朴正熙的信任。

“这样的时候， 金钟泌也必然同愚钝的人们结成一伙的。”

但是，金钟泌不仅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企图篡夺更大的权力。修改宪法的可能性倒不是没有的。但修改，不过会改得更恶，外加上各种装潢罢了。可能要专为平息目前群起的民众的呐喊而修改。朴正熙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和某种势力狼狈为奸就深感不安的蠢材。那末最近他在什么地方打下这种势力地盘呢？

我的一个朋友新闻记者说：

“虽不是确切的消息， 象是图谋政变的军人被捕了。据说三十三名和二十九名军人先后两次被捕了。因此，看来朴正熙最近是同那些军部里的带有反共、反日情绪又带有一些反美情绪的人当中那些不太腐败的军人勾结在一起

的。他们是支持朴正熙的头脑简单的一伙。他们认为朴正熙一垮台，就会造成大混乱，被共产军吞掉。

“而且他们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讨厌的一伙， 他们撒布神话，说朴正熙是有良心的人。

“因此，他们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审判。

“他们深信在军事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人胆敢抗拒的。企图以这伙人为前矛，推行强硬政策，巩固内政。”

我们只能说朴政权搞的是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方向的统治。可以说通过这次反日、反共运动，更加深了国民的不安。忧郁情绪突然变成了反日。朴政权是翻云复雨，变幻无常的。不知要把国民带到哪里去。对于选择方向，国民是不准说一句话的。

这次反日运动虽是在朴政权的操纵下进行，可是这一运动确实进一步加深了国民的传统的反日情绪。连那些小学生都在说，“日本人是坏蛋”。如果把日本造的学习用品送给他们作礼物，他们就不愿收下， 说“不是说不准用日本货吗?”

有个朋友说,通过这次反日示威亲眼看到了,和情报完全隔绝的国民是多么可怕。在韩国，原则上只有一条出自朴政权的情报。因此，对于文世光受北方的指示，在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支援下企图肆行恐怖这个说法，国民就毫无疑问地断定是对的。与情报隔绝的民众会立即被引进暴动中去。现在朴政权显然在利用它来搞“玩火”的勾当。而这里令人担心的是韩国民众是否在朴政权以后也要因此而长期患后遗症。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受到善良而豪放的领导部

的统治。我对于日本黑暗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担心是否在日本也会举行示威，以回答这次在韩国发生的反日运动。看来，日本冷静地注视了这一疯狂的示威。我不能不想到日本也成长起来了。这是因为我还记得关东大地震时杀害韩国人的事件。

日本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以及日本是个开放的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打破了历来"以血还血!"的报仇常规。但是后来听说日本极右势力不顾韩国的反日运动，却绝对支持朴政权，这使我不禁发出苦笑来。可见，没有发生反对韩国的对应示威也是不足为奇的。我这样自问自答，沉入了象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凄寂的心境之中。

今天我想再谈一件事就结束这份通讯。

那就是反日示威当时发生的切断手指（九月九日所谓"天安决死队"的三十多名青年说是为"表示反日决心"，切断右手小拇指的事件）的骚动，目前在汉城流传一条风闻，说这一骚动是囚犯们干的行径。据说他们以切断手指为代价，由政府担保对他们减刑，每人还分别获得了十万圆至十五万圆的奖金。据说，示威当时，摄影记者事先到现场等候示威者；切断手指时救护车和护士也先到现场等待囚犯。

当他们的这种"爱国行动"一结束， 他们立即被护送到医院去，政府要人和执政党国会议员纷纷造访这些做出"英雄行为"的牺牲者，还给他们另发慰问金。这真可谓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断指哀话"。朴正熙到底打算怎么办？我国有一句愚蠢可怕的话："管他你死我死拼到底"。朴某你难道竟要拿韩国国民作对象干出那种愚蠢行动不成？

政府报道说，近来也有成群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到安置在铜雀洞国立陵园的陆英修之墓去烧香。说什么这是因为国民感谢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那个女人的“殉国”精神，并希望以朴总统为中心使“国民团结”。又说这是因为，思量那个女人之死，就越发激起对北方的敌忾心。但是对我来说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农村小学校长讲给我的话：

“我接到了要到陆英修女士的坟墓去烧香的命令。我想到连为这种事也要被迫动员去就觉得我这老头也够可怜的了。于是我想应该表示抗拒，哪怕是消极的也好，就打发下级职员去了。

“我这个人自己避开不去，却硬要别人去，这种欺人手法使我至今还感到良心的责备。说不定命令还要下来，也许有些夸口，但我决心，就是为这件事丢了脑袋也要抗拒到底。……”

在暴力面前我们非这样灰心失望不可吗？我们不就是因为在暴力面前灰心失望而事先就遭到失败了吗？我认为所谓暴压性权力就是凌驾于民众的这种失望之上的外强中干的力量。

如果人们不认识这一点，不展开大胆的斗争，这黑暗社会是不会结束的。

越积越大的忧愁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讯

环顾四周，样样事情都叫人发愁。

天气变冷，就会使人惦念狱中的人在这冬天也不能回到暖烘烘的火炕上来。记得有一位先辈说在狱中最难熬的是夏天。两个日本人作为政治牺牲品非在监狱里过寒冬不可吗？日本政府早把他们俩抛掉不管了吗？从这种意思上来看，“八·一五惨案”使朴政权变得傲慢，使日本变得卑劣了。

怎么竟会这样惨无人道呢？他们甚至不准上诉者同家属会面。 他们也没有让日本人早川的妻子同他会面， 甚至虐待了她。审判和家属的会面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暴力，也不是可以表示一些大方的态度吗？可是他们一味毫无理由地诚心虐待人。

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呢？对于那些决定不上诉的既决犯也只允许同家属每月会面一次，而时间又限为五分钟。

法庭不允许旁听。理由是法庭太狭窄。其实走进去看时法庭却很宽敞又空荡荡的。就是允许旁听时，也只让家属坐在最后一排。当被告退出法庭时，他们的妻子为看看丈夫的面容要走到前面去，就被看警拦住，还要挨打。难道因为热爱国家， 渴望民主， 就要经受这种痛苦吗？相

反，如果同腐败融合在一起，那就太平无事了。

曾有过这样的事：政府高级官员的夫人和国营企业组织的要职人员的夫人走私价值几亿圆的宝石分脏的事被检举成案。高级官员们为之被革了职，但搜查就此停止了。这是因为在朴政权内部，人人都分享着这种特权。他们所以被迫让出高官地位，是因为朴政权想利用他们来进行所谓消除腐败的宣传运动。因此高级官员们不再受任何追查，不久还会重新登上高官地位。换句话说，他们算是听候最上头的“命令”的。饶恕腐败罪行也罢，追查责任也罢，他们心里有数， 这都是为最上头编造的把戏， 所以没有问题。

屈指的大公司不给职工发工资。新闻报道说他们一连几个月不发工资。到底让职工们吃什么活下去呢？我国有所谓“企业倒闭，企业主却在肥大”的奇迹。面临破产的坂本纺纱公司拥有无法收回的一千万美元的债权和达二百五十亿圆以上的债务。据新闻报道，坂本作了“债情报告”。他说，对祖国的爱使他在韩国经营企业。关于和政治相勾结的特别贷款和亏损的这类报道是层出不穷的。韩国的银行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把国家的财产装进私囊，这就是给朴政权作后盾的人的基本态度。但是国民却只能哑口无言，表示完全支持。

对市民来说，不用说物价，还要为口粮和燃料发愁。当局一直说今年粮食大丰收， 但近来又更正说比平年稍好。有一次报纸揶揄地说，虽然常说粮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但是进口的粮食却逐年增加。今年，全罗道一带发了

五十年来罕见的大洪水，但当局发表说粮食产量能超过平年水平。然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粮食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据说政府只能确保所需口粮的百分之七十。政府很怕会发生粮食暴动，再加上各种难题重迭，弄得自暴自弃，越来越变得神经质了。汉江也完全被污染了，自来水也面临了污染的危险。由于米粒里检查出重金属污染物，闹得议论纷纷。

为了增加出口拚命地挣扎，但胶合板和布匹等重要产品却一直滞销。由于石油波动，冬天用的燃料也成了大愁事。煤球实行过供给制，但也失败了。主妇们挥动着煤夹子，举行示威抗议供应低质煤球和不公平的供给制。因而闹出了把一些老妇扣押起来立刻审判的骚动。朴政权到底要人们怎样过这个冬天呢？有个朋友愤愤地说："我们所经历的不是长期忍受痛苦的历史吗？饿着肚子痛哭饿荒了就昏倒。除了这样熬下去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只顾扑灭眉前火的弥缝策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这样可能会闹起意想不到的大骚动。

韩国的报纸不能随便刊载经济问题，理由是它会刺激国民。但是，国民却用亲身体验感触到一切问题的。近来韩国的报纸给外国的消息提供相当大的篇幅。他们对本国发生的示威之类，只登在报纸的偏隅一角上，而对在越南发生的示威却大书特写地报道。例如菲律宾总统说的"如果国民希望，我就甘愿让位"的话却用大字标题刊载了。"反独裁斗争，越南言论""阮高其滚下台！越南国会议员、言论界人士、教授、律师等一百名要求"，报纸上的这些大

字标题传达了世界的动向。世界上独裁政权接连被推翻，而唯独朴政权为什么象黄金城一样稳当呢？这一历史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最近，从韩国也传来批判的呼声，说朴政权因实行独裁和镇压民权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当然是攻击朴政权的呼声，同时也表现了担心由于朴政权的作为，使韩国和韩国人的暗淡印象传遍世界。同时，所以有这种批判的呼声，不仅是因为担心因实行独裁和镇压民权而变成所谓自由世界的异端者的朴政权面临危机，而且还担心韩国本身也会面临危机。对此，金钟泌等人说，朴政权决没有孤立，并断定，说这种话的人是事大主义者。朴正熙也在十月一日“国军之日”攻击了向往民主的人。他说：

“反对我们的那些侵略者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内部产生漏洞。……如果有人不顾这种情况，要想和别人一样全部享受赋与自己的自由，而且想把自由只当作自由享受，并认为能够享受自由，那么，对这种人只能把他看作是不识时务的富有幻想的浪漫主义者。”

“尽管我们受到的共产主义者的挑衅那么严重，曾受到的损失又那么大，而且现在也依然受到他们的挑衅，但至今有人还没有从恶梦中醒悟过来，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不能不说这种人简直可怜到家了。”

朴正熙可以说是在被封锁的状态下维持自己政权的最好战的执政者。再加上，传说近来韩国政府热中于发展原子武器。十月十日在国会咨询中，执政党议员和国防部长官之间进行了如下的一问一答：

议员："最近外国的一家杂志报道说，韩国具有发展核的潜力，这是不是事实？"

长官："看来北韩从此采用米格——23飞机。为了对付它，我们也正在加强装备。北韩拥有的潜水艇给海战带来威胁，这是事实。所以，我们也正在加紧推进针对潜水艇警戒的潜水艇装备。"

政府为什么让他们公然进行这种一问一答呢？

国防部长官的回答意味着什么呢？据说朴政权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所编制了巨额特别预算。美国不大欢迎韩国发展武器。于是，韩国打算同加拿大建立合作关系，象印度那样推进核的发展。据说，其财政由日本的一个大公司提供，这是和日本本身正在探索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关的。只要对本国有利，大国就可能连发展核的设施和毁灭性武器也都卖给任何人。

如果是具有同毁灭性武器相适应的高度的国家理智的国家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好战的朴政权不知会干出什么勾当，有时狂症一发作，甚至让罪犯切断手指，举行反日示威，给这种政权提供核武器和毁灭性武器的用心何在呢？如果韩国拥有核武器，显然北方也不会坐视不动的。难道要允许朴政权这个属于世界上最好战的政权干出危险的玩火行径吗？朴政权的野心可能是要和军部相勾结干出那种大冒险行动，以图在国内延长自己的政权。这难道不是把屠刀交给疯子，却叫世上的人们高枕无忧吗？韩国国民很久以来就因为朴政权拥有军事力量，被夺去了酣睡的权利。让朴政权发狂的大国，今后一定会比现在更加担

忧。因此韩国需要出现热爱和平、确信未来的民主的政治势力。

不 屈 的 斗 争

在野党——新民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抬起头来了。这一党的半数以上的议员被人非难为假在野党党员和“要领主义”者。可是如今他们才好象一点点地重新鼓起了勇气。近来惹人注目的是他们为了讨取国民的欢心，在国会上作了些强硬的发言，新当选的新民党总裁金永三，于九月七日在国会上，用代表新民党提出质问的形式，强烈要求“要修改宪法，打开能够使政权和平更换的道路”。下面援引他的演说中的几段话。

“现在这一瞬间， 我再次看到国民在今天这样令人窒息的形势下热切希望带来某种变迁的痛苦的表情，同时感到脑海里充满着为我们的事业担心的自由友邦的关心和忠告。……

“不管用什么样的雄辩和理由来说明， 十月的事态毕竟招致了历史的倒退。……十月事态曾是一个政变。不是为改革的政变，而是为保证政权安全的变法；不是为前进的政变，而是招致历史倒退的政变。……

“不带拘票把信奉民主的人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可怕的重刑处决。政府的这种行径，使今天的体制的本质昭然若揭了。……

"对政治家来说，怎样退出现在的地位， 要比怎样爬上掌权的地位更为重要。我们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伟大的政治家在国民的鼓掌声中，以高尚的态度辞退的道貌，今天对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退任的伦理。"

他还抨击了镇压人权的暴行，例如把前总统在软禁状态下拉到军事法庭的暴行； 在法庭逮捕律师这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也未曾有过的暴行，等等。 关于学校问题，他说：

"有一位诗人曾经指出'没有自由的学校便是坟墓'。如果把将担负民族历史的下一个时代的我们的第二代国民培育在坟墓里，那末，这个国家的未来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金永三总裁反驳朴正熙把要求民主的人说成是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者这句话，他说：

"如果说，谈自由论民主是浪漫主义，那末， 当权者独揽政权的主人——国民的自由，拿它作弄人，忽尔赋与你，忽尔夺回去， 这种出尔反尔的统治方法， 又是什么主义呢。……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总统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大长工。"

金永三还发誓要站在国民的前列进行斗争，并要求修改宪法，无条件地释放被监禁的人士。

我认为，他这一席话确实是开创新历史的演说。不用说金永三他个人，就是在野党也可能不轻易从这一线上后退。据说，登载了这一演说的在野党机关报《民主战线》竟印发了九十万份，在街头上，转眼之间卖光了。这个数字比任何一家日报的印发份数都要多，而且这是《民主战

线》创刊以来最高的份数。警察竟以违反交通规则为借口把贩卖《民主战线》报的人抓去了。

执政党方面已经在金永三总裁作演说的前两天，就闻到它的内容定会强硬，便威胁说只要违反宪法就严惩不贷。然而，金永三在前一天，在自己的家里油印讲稿，第二天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国会，并在国会上开讲之前就分发了它。结果，弄得执政党方面措手不及只能陷入混乱。据说当在野党议员们事先商讨的时候，估计在国会咨询上金钟泌对金永三的质问的回答一定是一篇谎言，就决定在野党全体议员在金钟泌作回答时一齐退场。然而，他们在这一点上倒是做了让步。金永三总裁在自己演说的最后部分说，总理不必对他的质问作回答。但是，金钟泌却跟往常一样东拉西扯地罗列一大堆，替自己作了辩护。

同时，朴正熙在翌日即八日，召集言论机关的代表，宣称："决不容许对维新体制的任何挑衅"，这样他自己直接上阵，摆出了要决斗的架势。为"维护维新宪法""保障政权的安全"即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向来是这样直接赤膊上阵的。他不想缓和一下强硬的态度。据说，要在十月一日"国军之日"作的演说稿，也是他亲笔写的。演说稿中，甚至插入了一些"没知觉"即缺乏知觉的家伙的这么苛薄的字眼。后来，经他的亲信的修改，才勉勉强强稍微和缓了一些。他正在窥视机会给在野党、带有批判情绪的知识分子、学生、同宗教有关的人以当头棒喝。然而，我想，这可不是那样简单地做得到的。

现在，允许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报道外国的消息，也几

乎都报道在野党在国会上的质问内容，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为福特总统访问南朝鲜而装模作样的。国民通过自己的体验清楚地知道，朴政权本身是不会那样宽厚的。政府本身也可能认识到，越压迫国民，国民就会越接近爆发点。有一个时期流传过监狱里的人们将被释放的消息。但朴政权似乎还没有从政府缓和了镇压就会崩溃的这种恶梦中醒悟过来。并且朴正熙认为，政权一崩溃，自己也就呜呼哀哉了。十月九日，在天主教圣年弥撒以后举行的示威，给了很大的冲击。由五名主教、一百多名神父、三百多名修女领先，三千名教徒跟在后面举行了示威。他们要求释放池学淳主教，恢复民主和人权，接济穷人，恢复言论自由。但他们的示威遭到机动队的催泪弹的打击而被解散了。然而，这次示威从市民参加示威这一点上，确实使政府受到了冲击。在路旁，许多人以恐惧和期待的心情，注视了示威。

后来，各大学陆续进行了反政府示威。而且还有许多大学依然处于停课状态。在新教教堂里，每星期四上午为被监禁的人们举行祷告会。参加祷告会的也有被监禁的人的家属，祷告会总是涕泪满堂。而在教堂外面，有机动警察队坐在汽车上，等候他们走出教堂。听说，教堂里也夹着很多中央情报部成员，他们的心情到底会怎样呢？也许想着糊口是难事，哭在心里的吧。不，或许他们愤然憎恨教徒，认为因为有这些人才这样受苦受累。曾参加过这次祷告会的一个外国人对我说，为“痛苦中的美”所感动，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盟付出了最多的牺牲者。会长以下

的全体负责人都被关在监狱里。全体主事级领导者也都在监狱里。据说因为这个缘故，联盟的职能也瘫痪了，办公室也处于关闭状态。这个联盟同被监禁的人的家属一起，再次举行了二百人参加的集会。这是不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顽强斗争的可歌可泣的集会。集会通过了“十字架宣言”，重申“在任何政治形势下”“也都要开展反对罪恶和非正义的抵抗运动。”

据说，在这一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学生们，都是被监禁过的人。有一个学生是三月二十八日被捕的，对于将在四月三日举行的示威问题，他受到了详细的审问。他在受审时带着幽默的语气说：这么说，中央情报部已经估计到示威在那天举行，而事先采取了紧急措施。如果我们说一句反日，就要被中央情报部逮捕，但是，金钟泌总理做出反日行动却被看作是做了好事，这岂不可笑？如果金钟泌也因为做出反日行动而被捕或入狱，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才算是公道的喽？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朋友说，“学生们不再害怕暴力了。以前他们抱的是悲壮的决心、紧张情绪和恐惧心理，而最近却能说上幽默语了。看来，他们有了信心了。”他们养成了不畏强暴的精神。下面介绍他们在集会上朗诵的一首诗，和曾被监禁过四个月的一个学生的“狱中日记”。

那 个 日 子

一、花园里没有一簇花。

副 歌

今天是那个日子吗，那天将是何时，
太阳落的日子，星星消失的日子，
日暮降临，不再有旭日的那天。

二、牢房里没有一名是罪犯。

副 歌

三、主上再也不能回到心里了。

副 歌

太阳坠落的那天， 是犯罪消失之日， 星星坠毁的那天，才是军人离开之日。今天，连朵花也没有，罪犯不是关在监狱里的人，而是在外面审判被监禁者的那些人。

× 月 × 日

……你见过搜查对象某某吧？

不要提那些离奇的问题， 只要把这个给我弄清楚就行。于是，大天白日在大学区内公然演出了一场人质剧。接着，就被拉进了屠场，象一只不懂事的顺羊一样。不知

以后还会出什么事情呢。……

笑吧，放声大笑吧。令人发疯的世道，你要发疯，就要用高尚的方法去发疯吧。在台风的漩涡里是不可能听到麻雀的悲鸣的。谈自由论正义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不是被当作狂人，就是被诬为共产分子、祖国的叛徒吗？……

我不由得想起耶稣的一句话：天上的飞鸟也有巢可归，人之子女却没有立足之地。

× 月 × 日

原来自由战士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是冰库旅社（西冰库的审讯室）。摘下学训团（大学生预备军官训练生）的标志和大学校徽，解下裤腰带，被带到杀气腾腾的地下室，举行了报到仪式。厚厚的铁门哐当一声关死了。是个稍微收拾过的小小的房间。四面都被堵死，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心痛欲裂，恨不得一头撞在混凝土墙上砸个粉碎。不，不能那样做。还有很多渴求的未竟之业呢！被拉到外边，不是挨骂就是挨打。……

递给你一根火柴，就叫你用它表演枪击术，叫你跳舞。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不用功的人＝极少数的学生＝不良分子＝扇动分子＝不孝之子等竟然有这种等式。……一切都被歪曲了（我真想看到的不是傀儡，而是人的容貌，也想听到人的声音）。从内部有线通话机里传来朋友的名字，还能看到上厕所的某兄，浑身涌现了力量。用手指甲在墙壁上刻上无数个“自由”“正义”这个字眼，手指都快要磨出血了。

× 月 × 日

你到底想怎样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这是审讯官说的话。他把对我有利的都给删去，竟歪曲事实，写了对我更不利的东西。我的口供仅仅作参考罢了。审讯一旦中断，稍事休息，就转入私人对话。于是我就申述了我的信念的正当性。旁着我的一个审讯官可能听得有些不愉快，大声吼道"你想对谁说教这些啊？"真是个乡巴佬，他以为我会被他吓倒呢！……

这还是斟酌情况写的一段日记。

他们等于还处在软禁状态中。在获释的时候，被迫许下种种诺言。可是他们挣扎着即使是这种程度的话也要说出去。

衷心希望他们尽快恢复健康，一切正常。一个学生虽然出狱了，但是由于脸部神经麻痹，说话不自如。

我们不能不继续写可悲的证言。

三 篇 呼 吁 书

我听到这个通讯订成一个册子供许多人阅读的消息，不禁深受感动。 现在， 韩国的有良心的人所以能够得到那么一点点的保护， 也是靠外国社会舆论的力量的， 这

样说也决不过分。希望你们继续激励我们。据说，最近，朴政权想要改变对外国社会舆论的态度。他是想，与其进行较量，不如把话说得稍微温和一些。当然，他们要掩盖自己的本性，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同时还用实际不存在的机关和个人的名义，给外国的各界人士和机关写信。据说这是因为衷心希望他们对自己有所理解。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花言巧语”。我们提醒你们，那些不写明发信人真实姓名的韩国中央情报部的信件可能会飞到你们那里去。

最近他们用的，不是判徒刑、判死刑等方法，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监视和带走的方法。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对我说，近来，如果为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人而举行集会，假令参加集会的大约有二百名，那么其中就会夹着五十名中央情报部人员。这为的是，如果与会者们要举行示威，他们就要当场加以镇压。据说，他们对于同样的行为，直到夏天，还判处了二十年徒刑和死刑等，而近来，却只是带走扣押一两天，或最多拘留二十九天。看，这是多么怪诞的世道啊！

在朴政权统治下，即使是同样的行为，也会得到如此天壤之别的待遇。难道这能说是有法律的国家吗？规定二十年徒刑或带到中央情报部去扣押一天等这种差别，难道不该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定，而该根据掌权者的慈悲心而定吗？真是岂有此理！韩国的命运论“四柱八字”，可能就是在这种状态中诞生的。也就是说，人的命运是为诞生的时间所决定的。

不过，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只要被带走，就不能平安

无事地放回去。一定要在什么文件上签个字。文件里花样不少，例如我要专心致志地念书啦，不再说牵涉政治的话啦，决不参加共产主义者扇动的活动啦等等。有时，外国人也会陷入这种境地。有一位传教士主张：人民革命党事件是捏造出来的，因此应该取消为这个事件而被判的死刑。结果他被迫写了一张不再谈论有关人民革命党的话的保证书并签了字。

这种事情在朴政权统治下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有人说，要写就给他们写一张，然后装做若无其事，再去干不就行了吗？不过，这个问题也不能想得那么简单，所以人们沉于苦闷。有些人是承认自己曾写的罪过，又去从事同样的事，重又被抓了去的。

请看，十月八日在汉城大学和高丽大学等地散布的呼吁书。题目是《按照真理行动吧，我们的朋友们!》这是用狱中之信的形式写的。

夜里的寒气透进褪了色的蓝色囚衣。

不知不觉之中，已过了春夏两季，在中秋之夜，苍白的月光也射进孤寂的牢房里。那夜，不知为什么，思念着你们，未能入睡。握紧铁栅栏用力摇了摇。隔着对面牢房的铁窗，看见了朋友苍白的面容，使得我更加热爱祖国。……

……

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举目看看摇摇欲坠的祖国。同时要想一想，现在不正是该伸开有力的胳膊，献出纯洁的热血的时候了吗？

你们记得吗？三年前的十月，正是那些枪口，对准控告那长期执政的堕落相的我们大学生，从他们身上夺下书包，赶出了校门。他们倒在路边呐喊，望着被军靴践踏的学校切齿愤恨，攥紧了拳头。

那些被迫剃光了头，穿上军服，被拉到论山（新兵训练所）的朋友们，也回到学校来，看到我们那没有主人的书桌，想必回想过四月的呼吁吧。……

同学们！对于我们的历史，让我们做深刻的反省吧。

那不就是对强者的屈辱的事大主义和依附吗？

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蹈复辙呢？

连那些在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而被捕的人的释放问题，也要依靠强国元首的访问来决定，这种屈辱和机会主义，使我们郁愤满腔！

大学方面的人主张什么凭良心和正义进行的释放同学签名运动，应该得到教授的批准。这些人不就是纯粹的傀儡吗？大学的灵魂就此死灭了吗？

渗有前辈们的血史的民主，必须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努力和斗争来维护。一个个人的话就成为法律，在这个法律下遭到残酷蹂躏的民主人士和我们学生们，慷慨激昂地呼喊着。大学方面的人们，你们曾经高呼，知识不仅要掌握，进而要付诸实践，这才是真理。你们为何胆怯地低下了头呢？为什么只是忍受良心的痛苦呢？……用拷刑和欺骗编造出来的审判、秘密审判的真相既然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必要踌躇动摇呢？请你们打消贪图安逸的念头，勇敢地站起来吧！为了我们祖国和国民，要行动起来！

要采取正义的行动。

朋友们！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的呼声吗？忘记了曾在七叶树荫下，一同担忧祖国未来的我们的郁愤吗？

我们的心中依然热血沸腾。

自由、真理、正义、热爱……

我们相信，为正义而斗争的朋友们和大学方面的人，将一定会让我们看到晴朗的秋空，相信我们互相拥抱着汇合到救国斗争的队伍，迈出矫健有力的步伐。朋友们！自由的钟声，到底什么时候响彻云霄？

如今，狱中的年轻人和外边的人，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斗争时期都更感到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同情。看来镇压越残酷，斗争欲望和对同志的同情就越强烈。下面再谈一个悲切的呼吁和证言。

所谓同人民革命党有关的人特别是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夫人们，开始鼓起勇气活动起来了。当权者把政治对手诬为赤色分子加以处决，这种事情在韩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当时，只要说是赤色分子，连自由主义人士也都保持沉默，是一般的常例。掌权者热中于把国家变成一个凡是赤色分子就毫不留情的那种国家。结果，反共成了他们统治的基础。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被执政者诬为赤色分子而处决的这种命运，也会落到自由主义者的身上。

我听到七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们的夫人的痛切的呼吁，不禁感到惊讶。因为那些女人也会被诬为赤色分子，所以不可能公开呼吁。这是因为过去她们也曾被诬为赤色分子而不能昂首挺胸地活下去的缘故。

有一个人因为没有钱缴出儿子上高等学校的入学金，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但这件事却被他们捏造成领了革命资金，以致被逮捕。于是他被判处了死刑，他的朋友则落到了二十年徒刑。

连三岁的小孩也因为被诬为赤色分子的家属，就受邻居孩子的迫害。

据说，邻居的孩子们把木制玩具手枪对准他，威胁说要枪毙。在遭到社会上的这种排斥和迫害下，他们怎能爱这个国家呢？

在国际大赦令会议的一个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夫人冲着麦克风呼吁说，珍视生命的尊严的我们兄弟姐妹们，请你们拯救由于违反紧急措施而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的生命吧。并且说，他们背上了所谓策划共产革命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她们到基督教徒的集会上，请问他们为什么不为这七个人做祷告。她们眼看着丈夫的死亡和对孩子的迫害，豁出生命进行了斗争。

首先有少数美国人传教士，响应了她们的呼吁。一个为拯救生命的请愿签名运动开展起来了。同时，也向外国发出了呼吁。直到现在，日本认为韩国是个反共国家，没有去议论他们的问题。然而，这个运动是针对把前民青学联事件捏造成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的朴政权的诡计所发起的彻底的挑战。

事实上，公布这个事件当时，中央情报部和朴正熙本人真是气焰万丈的。可是，如今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捏造

的事实。如果被判处死刑的人们也没有罪这一事实广泛传开，那么，这个事件的真相将暴露无遗。所以，中央情报部在拼命防止这一危机。基督教的有关人员们，也进一步推进援救运动，为他们做了些事情，并做了祷告。由于美国人的活动，美国的出版新闻界也都对此表示了关心。

在国际大赦令会议上发出呼吁的两位妇人中的一位，因受到中央情报部的压力，就地昏过去了。据说，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在圣母医院里。等她有所好转，在医院里勉强走动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中央情报部人员。于是，她就大声呼叫起来，两个中央情报部人员也就逃之夭夭了。她急忙跑到车站，搭乘了开往大邱的列车。我衷心希望她的这种拼命的努力能结出应得的果实。

最后，在福特总统访问韩国之际，坐牢的学生的母亲们揭露韩国现状的文章中，节选一段，介绍如下：

如果，总统来了，朴政权在任何一次会谈中也都将千方百计地往坏的方向利用这个机会。他会趁此机会，欺骗国民，把一切诺言都用到延长自己的政权方面。这是可怕的事情。

朴政权统治的延长，将使韩国越来越陷进黑暗的深渊中。国民的安定，是谈不到的。希望对这一点深加考虑。

我们做母亲的因为把儿子在军事法庭上说的话传了出去，就被带到情报部和警察署，受到许多次审讯，遭到毒打，弄得不省人事。

当被抬到医院里受治疗的时候，就有四五名韩国中央情报部人员到医院，反复进行审讯，逼得我们一连几天不

能睡一觉。护士们在旁边看到十多名警察进行惨无人道的审讯，也都一起流泪哭泣。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国民盼望着解放的日子早日到来，期望阁下作英明的判断。

把写有这些内容的信给福特总统送去。从今以后，这种斗争将在国内外开展得更激烈。为恢复韩国的民主，究竟要付出何种程度的牺牲呢。韩国的秋空，难道你还要吮吸众多的人的悲痛之后，才能洒下更加清亮的光彩吗。我为我只能仰望着天空哀声叹气的软弱的自身而感到惭愧。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抒情诗的时代

韩国通讯　　　T・K

相互提携的人们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讯

现今韩国民众的斗争，使人想到，它在历史上将会造出许多东西。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民众对执政者的议论。据说，总统官邸青瓦台附近越来越变成要塞，现在已经是更臻完善的地方了。青瓦台后面的北岳山上密布着火力点。青瓦台附近的很多居民都被撵出去了。这些人们大部分只好渡到汉江南边去寻找新的住房。

据说，朴总统的神经过敏症越来越严重，晚上睡不好觉。据说，他常常在深更半夜出现在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和中央情报部。他本来就是全靠它们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维持自己的权力的，这也就难怪他在半夜里也想起它们来。

由于福特总统的访问韩国和在联合国造成的事态，近来抗拒的火炬到处都在燃烧。然而，这个朴政权是一向走极端的政权。时而显出一些似乎要退让的颜色，时而忽然

又板起面孔来。显出似乎要退让的颜色，可能为的是要试探一下对它的反应如何。

国民确实是在这种考验和变化中受到锻炼的。但是最近使人强烈地感到，某种反复过程在不断进行。人们就是被抓去也毫无惧色地跨进中央情报部或警察署的大门，而后最长也不过二十来天就会出来。他们在那里要立字划押：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问题。这已成了一种惯例。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出来以后还要搞同样的事情。一位朋友喃喃地说这真是奇妙的事，他说：

“如今，被抓去也不感到害怕了。学校不会把门关死，只要把门打开，我们还是可以搞的，教会也一样，既然不能‘封闭’它，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是用刀枪夺取的政权，可能不会轻易地让出来。可是，已经很清楚，再也不能用刀枪统治了。”

我感到，对朴政权的反抗，如今已经是所有国民的共同的感情。前几天，政府发表公文，说什么值此朴总统夫人四十九周岁之际（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行纪念邮票以志追悼。他们可能要发卖六百万枚十圆钱的邮票。难道朴政权不这样出卖死故的夫人，就无法统治国民吗？想到这里，实在令人甚感不快。有趣的是，我坐的出租汽车司机也发出了同样的牢骚。于是我就试探了他的内心，说“听说那个女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接济过很多穷人哩。”但没想到他竟脱口说：“那是她自己的钱吗?！还不是用我们的钱卖人情?”

我想，用夫人的悲剧玩弄政治把戏已经行不通了。可

是，政府却力图把那个女人的坟墓修饰起来，使它变成一种象征。就是这种错误认识给今天的韩国带来了不幸。

那天， 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想法了。 看来朴正熙这个人，确实有些不正常。他是想即使用这种办法也要保住总统宝座，他对权力的欲望倒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他还在想由于以后必将降临的自然的死亡而退出政权后也能如他所企望的那样会凌驾于这个国度国民的头上吗？如果现在害怕民众的抗拒，怎么不能推想正如那个汽车司机说的那种指责会传遍全国呢？难道这是想在国军的茔地上修起那么讲究的夫人之墓，就会永远受到瞻仰和尊敬的吗？怎么就不能想到就是现在也选个僻静的处所把夫人葬到那里去以备万一岂不更好？ 现在采取这样一种有人情味的态度好不好？ 也就是说：“……那个女人素日希望回到谧静的故乡。尤其现在是举办一切事情都要求俭省的时候了。‘北方的威胁’在当头，经济又处于危机，……”

如果他能想到这一点， 或许不会行使今天这样的暴力。韩国人是遭受长期压迫的民族。而且是没有那种把国民的精力有效地利用于建设方面的经验的国民。我从不记得他们曾有过珍视国民、得到国民的尊敬和信赖的执政者和统治阶层。因此，在国民中间涌出了强烈的民族愿望。那就是要同那些为国民甘受痛苦、为国民甘受辛酸的人一道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伟大的国家的愿望。与这种民族愿望相形之下，朴正熙已经丧失了资格。然而，他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韩国国民不大尊敬只是在争权夺利中打赢了的掌权者。看来韩国人总是喜欢经受过苦难的领导

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苦难会使他同民众的痛苦联结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大中是不是该把已经尝到的苦难承受一辈子呢。

最近，我对韩国民众的这种近乎“病态”的心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此感到骄傲。前几天，我接到了一位女学生的一种地下通讯。据说从今年年初起象这位女学生一样转入“地下”活动的人非常多了。他们为了生活费的问题，也向我发出过呼吁。现在把这份通讯的头几句抄录下来：

……请原谅，许久没能寄信给您。人们不是说无信便是喜讯吗？想告诉您的事很多，可是到了今天才执笔向您问候。……自从一月八日离开家以后，一直过着客宿生活。曾遇到过多次难关，可是我按照我的意志，和同事们一道，毫无屈色地进行工作。这种土拨鼠式的生活已经快一年了。新的灵魂在这块土地的各处大力进行着活动。现在和过去一样，彼此尽可能忌避相会。许多朋友离开家庭进行活动。……不管遭到任何暴力和镇压，我们一定要献出身心进行抗拒，一定要争取为全体民众的自由。为了在今年岁暮以前，为了从质量和数量上扩大救国斗争，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斗争。……

近来，政府的态度稍有缓和的表示。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镇压将更加深入，其手法将更加巧妙。反正，表面上将继续呈现沸腾的景象，地下活动将更加活跃。所有国民的反感越强烈，我们在地下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但是，

现在谁也不能断言，假如暴力政权长期存在，地下活动将会带上什么样的性质。

在谈到地下和地上的联系的时候，也应该谈到同狱中的联系。已受判决的许多年轻人陆续被押送到各地方的监狱去。所以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认为他们如果集体地聚在一起，他们的斗志就会更加高昂起来。然而，据说他们在离别的时候反而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运动扩大到地方去。最近，我看到了一位陷身囹圄的朋友写给他母亲的一封秘密信。

"……看到把一些年小的学生押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不禁流下了愤怒的眼泪。我们把毯子送给了被押送到举目无亲的××去的朋友们。如果有旧毯子请再送进一张来。……

"妈妈！我感谢上帝，我能够领受韩国悲酸的历史及其苦难。领受这个苦难是创新的喜悦，意味着战胜和进步。我想，这对在外面的妈妈来说也是同样的。愿您成为狱中朋友们的家属的力量。请您不要露出悲哀的表情。请您勉励他们。

"我们在这里，按捺着心胸，一一清楚地分析哪些作得对和哪些作得不对。希望妈妈也能够这样做。在目前的情况下，被释放能成个什么问题呢？出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热切地感到一九七四年会迎接新的转机。妈妈，您在祷告的时候绝不要乞求'释放'。请为我们的成长、战胜和民主做祷告。……对被捕入狱的人们来说，来自外面的微小的关心都会成为很大的力量。这里有些人连一点花费和

东西都不能收到，冬天里穿不上内衣冻得发抖。给我送进来的东西有一半分给了别人。……”

除此以外，信里还写了这里不便抄录的东西，也就是详细地叙述了外面的人们应该怎样斗争即有关策略的问题。我们为在这“十冬腊月”经受非人道的遭遇的年轻人，应该向全世界大声呼吁。

人是在痛苦中为战胜痛苦而磨炼成意志刚强的人的吧。这样的人们对新时代抱着理想主义的幻想，要求有新的领导者同他们共患难，这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其实，那些因为长期以来保持非道德的沉默而受非难的教授们，如今也开始对痛苦表示同情了。在教授会议上出现了请愿释放民主人士和学生的情形。教授们还举行祷告会，祈求被监禁的教授和学生得到释放。延世大学的三十七名教授举行了五天的祷告会。据报道，在祷告结束的那天，有一位教授在祷告中说：

“明明知道没有出席，而依旧打开点名簿呼叫被监禁的学生的名字，愿上帝保佑早日解除这种悲哀和痛苦。”

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校长终于关掉了大学的校门，并夹着自嘲的口吻批判今天的事态说：

“大学当局没能开拓光明大道，一向避开它，小心翼翼地抄后路和僻静的小径走，结果是抛弃了原则，迷失了方向。从政府方面看来，可能会觉得可恶。从学生方面来看，可能会觉得卑鄙无耻。在这无期无约的污秽泥坑的循环中，究竟要彷徨到什么时候呢？思想起来，大学的前途暗淡无光。希望给我们智慧，以摆脱这无止境的歧路，走

向光明的大道。……”（高丽大学校长）

“应该接受学生们甚至中断功课发出的号召和他们的这种激情。为了学校和社会，这也是值得的。”（延世大学校长）

高丽大学校长说学生的活动决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多数人的活动，是“有理的行动”。延世大学校长决然说，学生们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人士和争取民主的呼声是理应接纳的，学生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

在苦难的时代，受虐待的人们总是团结起来的。如今，机会主义者也对战斗的队伍表示同情，并且这种同情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在它的根底激荡着同样的感想和可歌可泣的诗歌。一位元老诗人咏叹道：

狂风怒吼欲吞山林，
枪弹乱飞划破天空，
到处都是闭门沉默，
淫雨连绵，烈日炎灼，
你为何不言不语。

声 明 在 泛 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近来，各种声明犹如爆发的山洪倾泻而下。其中也有在中央情报部的特别资助下支出昂贵的广告费大量发表的

声明，如“绝对不能容许反维新的妄行”。只要仔细观察这种朴政权方面发表的声明，就会发现最近起着一种显著的变化。那就是那些“以朴正熙总统为中心”的死板的陈词已消失，只是罗列一些“民族中兴”“为团结的维新体制”之类的词句。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要说朴正熙伟大，就没有说服力，所以只好号召，为了不致于招致“北方的武力南侵”，虽然有一些不满也要维持现行体制。看来，他们自己承认了要用强调对朴正熙的个人崇拜来维持他的执政体制的尝试已经失败。因而，他们是不是要说服国民为了维持现有的这种小小的安康，只好支持他。真是饶有风趣的变化。

也有不在上述广告上发表的声明，有许多声明是油印出来在少数人中间传开的。其中有的是强硬的声明，比如对金钟泌国务总理写道：“他是要用生存权这个幌子来践踏人权的恶魔的象征。”又有“为了确立真正的民主体制，朴总统要滚下台去”等等。

十一月二十七日，有七十一名领导人士用闪电般的方法发表了“恢复民主国民宣言”。于是他们组成了有在野党、宗教方面以及知识分子参加的“恢复民主国民会议”。尤其是，近来这种消息通过报纸的报道使国民广为知晓。应该说，现在确实变成了要求恢复民主的呐喊及其行动不顾那无止境的镇压而澎湃起来的时代。这种事例因为是理应有的，所以对外国报纸来说兴许是不屑一顾的资料。看了日本的报纸，就使人特别感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样的时

候，报道片断的消息还不如概括地介绍整个国民的活动。实际上，能够前进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外国的呼声给予了很大的力量。因此，我们为了争取胜利，越发需要外国的呼声。

朴政权慑于国内的沸腾景象，绞尽脑汁，要严格防止它的力量的源泉——外国舆论。他们对外国采取比从前温柔的态度。他们搞微笑外交，往往施展邀请战术。但是，朴政权象对待国内问题的态度一样，一旦觉得这种战术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就突然变卦，一夜之间又回到强硬政策上去。昨天的微笑无影无踪，变成凶险的表情。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民间的微笑外交也差不多都被约束在一个框框里了。因此，对话必然用如下的形式进行。

“马山自由输出地区问题呢？”

“那是报纸夸张的。特别是最近搞得很顺利。”

“妓女观光呢？”

“贫穷的国家么，一时又有什么法子呢。”

“为什么在蹂躏人权？”

“没有那回事。他们是犯法的罪人。”

“民主呢？”

“大韩民国本是自由民主国家。只因为北方有南侵野心，只好限制了一些。”

此外，尽可能送些特产品作馈礼，邀请到汉城来，并约定要好好款待一番。这样的时候，总是劝对方合影留念。这为的是向中央情报部报告活动情况时，用它来做证据。据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位“官吏”自豪地说，中央情报部的

这种政策收效很大。

在这样的环境中，《东亚日报》最近进行的斗争应该受到最高的评价。报纸连把基督教界的集会上进行的讲演和说教都登载了。这种共同斗争的情景除了日本统治时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外不是未曾有过吗？近来，对在野党的斗争也报道得很好。报纸详细地报道了有关在野党议员拒绝参加国会的消息和在这个期间执政党用闪电式的方法通过了预算和七十七件议案的消息。据报道：通过一项法案只用了三分钟，真可谓"效率高的民主"。并在韩国议会政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了三百亿圆的政府追加预算。报纸讥讽道："事情只能是那样，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嘛。……"

针对这种情况，全体在野党新民党议员五十五名投入了国会静坐斗争。报纸毫不踌躇地报道说，呼吁恢复民主宪法、释放被监禁的人士的这个静坐斗争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是"真诚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有二十名基督教议员举行了恢复民主救国祷告会。其中元老议员郑一亨作了如下的激动人心的祷告：

"上帝保佑，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够用眼看，用耳朵听，用嘴说话。愿上帝赐予那些为正义而斗争中被抑压的人们能够站起来的力量；让那些高呼自由中被监禁的人们获释吧。……愿上帝怜悯那些在这气温下降到零下的寒天，在冰冷的监牢里，此刻也饱受痛苦的、要遵从主上的意旨生活的年轻的学生、体弱的文学家和教徒吧。他们握着冰冻的铁窗，颂扬正义，高呼自由。我们向您证明，被捕的人

们并不是罪人；监禁了他们的人才是罪人。现在我们代表国民的心意，在这议事堂为同他们共同领受这一痛苦，在您面前下跪祷告。”

对痛苦的共鸣和同情才是制胜朴正熙的道路。不具备这一点，就不能作为领导者创造明天的历史，这种共同心理，就是在前总统尹潽善的上诉理由书里也如实地反映出来了。这里不妨援引一段他的上诉理由：

“我也知道，在诸位当中有些人说没有必要上诉，上诉毫无用处。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为恢复民主的作为，为何是罪？既然无罪就不能受罚。我若是成为无罪的罪犯，岂不是与这次事件有关的许多爱国者都要成为无罪的罪犯？故我认为，为他们着想也不能成为无罪之罪犯。若军事法庭执迷不悟，千方百计地企图给我扣上罪名，我也甘愿同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人们一道受重刑。将带来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但我誓要上诉到第三审。”

由于朴政权的诽谤，尹先生曾是几乎化为无有的存在了。又由于先生自己贵族式的生涯，被看做是不能同民众和年轻人对话的存在。可是他由于同情和帮助了那些受压迫、在战斗中受了伤的人们，到了年近八旬的今天，重新成了救国的象征。许多狱中的人的夫人和母亲们在某中角度上说，可算是不了解社会的软弱的妇道人家。但是，这些妇女也奋起进行了绝食斗争，举行了街头示威。还反对福特访问南朝鲜，到美国大使馆进行了静坐斗争。现在，这些斗争已经产生了惊人的力量。斗争和爱使她们创造了奇迹。的确，在这几个月当中，她们从政治意识上和伦理

精神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一次绝食祷告会上有过这样的事。一个美国人天主教神父同她们一起行动。但是这位神父被机动警察拖上了卡车。五个警官用长筒皮靴尖踢他。这为的是向他示威：做了极端的行动就不会有好结果。这时，有一位老太太挺身而出，说"你们要抓走这位美国神父， 那就把我也抓去吧。"便爬上了卡车。到了警察署，她还进行顽强的斗争，说不把美国神父送回去，她也决不下车。这样，闹得警察惊慌失措。对于这位为儿女而斗争的老太太，就是能干的警官也束手无策，没敢动她。在执行这种职务的时候，他们或许也没能把对母亲的传统的尊敬抛到九霄云外去。一位朋友把这条消息告诉我时补充说：

"朴政权往往对几十人的集会也要调动多于其数的机动警察来勉强收拾那个局面。十二月七日，当金大中去访问正在进行静坐斗争的议员的时候，为了取缔这五十多名静坐斗争中的议员和金大中， 竟出动了六百名警察。 现在，人类美丽的热情和同情竭力摧毁着这种暴力。联结那个天主教神父和老太太的也是那美丽的热情和同情。朴政权拚命地企图掐断这个美好的东西。"

国 民 的 印 象

由于有了这种同情带来的勇气，最近，"被监禁者家属协议会"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 从新年初就流传一条消

息，说若是采取柔顺的态度，就要释放部分被监禁的人。对此， 家属严厉地反驳道“要无条件地全部释放被监禁者”。声明又写道：

据报道，正在考虑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对违反紧急措施人士施行特赦，但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系者、北方的间谍和已判明是同情他们的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几名学生不在此例。如果，政府透露的这条消息属实，那么我们的家属要申明：不能默认隐藏在这种手法里面的愚弄国民的奸计和阴谋。

自从政府通过国务总理金钟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以“制造气氛”为条件释放被监禁者的一案以来，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说什么制造气氛啦、 反省啦、 自慎啦等等，硬要国民认识到监禁他们似乎是很应当的。一句话，这简直是“贼喊捉贼”。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丈夫和儿女决不是罪人，不是需要请求恕罪的人。我们的丈夫和儿女为了防止权力的绝对化，抱着要在这块土地上建设正义的社会这一愿望，自动背起了十字架，他们是满怀着作为历史的保卫者这一自豪感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真诚地为我们的丈夫和儿女作事并跟着他们走，不是单单为的解除对个人的监禁，而是忠实地跟随他们所采取的态度的道路，他们主张：“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主得不到恢复， 就决不出狱。”

朴政权为了压制民众的抗拒，急忙捏造事实，肆无忌惮地逮捕了许多人并把他们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以及二十年徒刑。这种临时救急的办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

深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处境。当然，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末他们以后还会怎样发作呢？

这篇声明，对有关被指为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系的人们的问题也作了长篇的抗议。这同过去一般地说是共产主义者就哑口无言的情景比起来，确实是完全相反的新现象。抗议的开头是这样的：

当我们接到在释放对象中除去了所谓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的人或策划建设社会主义的学生们的消息的时候，不禁对现政权的奸计和阴谋表示惊讶。所谓人民革命党到底存在过没有？捏造事实，把学生和民主人士硬说成是赤色分子的用心何在？……政府当局虽然承认他们的一系列紧急措施是一场政治上的大失败，却急于掩饰其错误，为了保持体面，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体面，施展着幼稚的跳梁小丑之伎。……

同四月里胡诌什么“民青学联”而掀起狂乱的搜捕旋风的时期相比，情况大有变化了。这是不是说，胜利越来越近了。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在取得这种前进方面来自外部的莫大支持所起的作用。在韩国的外国人基督教传教士的呼声和他们的参加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有关人民革命党的悲惨情景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前几天接到驱逐令的监理会传教士奥格牧师。

他向基督教牧师和学生的家属们呼吁说，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的人，是没有罪的，并要求为他们作祷告和采取行动。现在被扣上严重罪名的人们都被定罪为在人民革命党

的唆使下，要建立“赤色工农政府”的人。因此，只要有关人民革命党的问题被推翻，就便露出马脚来，那时，朴政权将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原形毕露的罪人了，正因为这个缘故，对奥格牧师下了驱逐令。

奥格牧师曾长期在穷苦的工人中间做了工作。他自告奋勇说，只要能许可，他愿意到江原道的山间和煤坑的工人中间去，自己也当工人，并同他们一道研究有关劳动的问题。这种愿望当然不会得到朴政权的许可。在朴政权的统治下，我们韩国人就应该这样地失去我们的真正朋友不成！

今天的这篇通讯里，需要传达的消息实在太多，感到担子太重了。本想介绍一下《东亚日报》登出的几篇大胆而高明的社论，但已经没有工夫这样做了。时间实在紧迫。加上健康状况也不大好。然而我坚持到了这个地步，这完全靠我要同受苦受难的同志们共患难的感情。《东亚日报》从前天（十二月九日）开始刊登了专栏连载文章，题目是“您在怎样度日？”编辑加上了如下的按语：

“在围绕着要求修改宪法和释放被监禁人士的问题形成的令人窒息的岁末政局的漩涡中，让我们观察一下，在野的元老人士怎样度日和想些什么。”

首先同自从一九七二年十月的所谓“维新”时代以后两年来一直被迫保持沉默的金大中进行了谈话。然后报道了被软禁中的尹潽善的消息。这么一来，执政党方面发动了攻击，说什么最近报纸在扇风点火。但是，报纸对此表示：至今很久以来一直受到了学生们的攻击，而执政党方面的这类攻击却是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并采取了付之冷笑

的态度。

最后，传达另一个事实，以结束今天的通讯。

目前，在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的有关杰克·恩德逊访问韩国的消息和他十二月六日写的“华盛顿·回转木马”成了话题。他写道：朴正熙在同他的谈话中，承认绑架金大中一事是中央情报部的一些过激分子的作为。据说，朴总统的回答是：“我向上帝发誓，我决没有参与过龌龊的事情。”难道他不曾知道，自从潺特盖特事件以后，世界已不肯相信掌权者自我表白的清白吗？恐怕许多韩国人对上述事件的前半部分会表示同意，而对后半部分是不会同意的。在韩国，几乎全体国民从一开头就坚信这是包括中央情报部在内的朴政权干出的勾当。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在韩国，那般重大的问题没有朴正熙的命令或同意是不可能处理的，也是不会处理的。如果朴总统的话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不想逮捕那些罪犯呢？对这个问题，日本方面到底有什么想法呢？这里附带地记下一位记者对这些问题同我交谈过的话。

杰克·恩德逊又是怎样澄清了这个问题的呢？我认为这里有点蹊跷。再说，朴为什么要对李厚洛说了些犹如落井下石的话呢？为什么要驱逐奥格牧师出境呢？既然不是傻子就不能不揣测到这里必定别有用心。这对同美国的关系特别是美国议会和宣传报道的关系决不会是好事。或许在国内方面有不可避免的缘由。朴政权一向对外国人传教士加以非难和施加了压力。执政党甚至说，要制定法律来取缔同外国人接触的“事大主义者”。但是，我想问题不会只

局限于奥格牧师等人对这样的国内政治所给予的影响。这是不是朴表示了进行挑战的决心，抗拒美国为恢复人权和民主而施加的压力。朴正熙正在企图对美国也挑起如同有关早川和太刀川两人事件一样的事件，可能的话掀起类似过去的反日运动那样的骚动。然而使朴苦恼的是，这不能象对日本掀起的那样如愿以偿。

我对这些话反复思量过。一方面，不能不想到，如果奥格牧师被驱逐出境，这将使韩国人对全体美国人的印象会变得更好。美国政府也一定会为人权问题有所表现。

许多韩国人认为，日本付出了早川和太刀川被监禁这样一个巨大的牺牲。这不是单纯的牺牲，而又是使两国国民之间结成美好关系的基础。被监禁者的家属当中，有些人担心： 他们在零下十度以下的牢房里， 能否熬过今冬呢？ 在这种气氛中，因为他们是日本人， 可能会遭受冷待。遗憾得很，虽然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但它和美国人的牺牲不同，在韩国人中间，对日本的印象并没有好转。确实是可悲的事。新任首相三木正在考虑要使日本在国际上博得好印象的问题， 这个消息也传进了我国。 不禁想问"用什么方法?"通过政府和财界的交际获得诺贝尔奖金这般程度是决不可能改变对日本的印象的。我又回忆起另一位朋友说的话。

这是在美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国名简略）， 一个韩国人在某地做了反对朴正熙的讲演。在那以后，他为了在回汉城的途中顺便到日本去一趟，到日本大使馆去要求给他签证。大使馆要他下午再来一趟，当他下午再去时他们对

他说，这件事须呈报本国批准，所以不行。原来护照上注明了经由日本，所以是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在他做过反对朴正熙的讲演以后，韩国大使馆方面已对日本大使馆有所委托。他说，他没想到日本和韩国直到最基层都是这样勾通一气的。

日本无论对哪个国家不是只考虑那个国家的政府吗？日本的法律或惯例，在其运用方面一向是有所差别的，是袒护强者的。正是这种措施毁坏了对日本的印象。难道日本想如果亚洲的时代起了变化，到那时再随机应变地行事就可以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亚洲得到改革的人们，应该同日本的哪些人交换意见呢。从真正同日本人结成温暖友谊的心情出发，很想接到来自日本的回答。

我们在韩国的斗争如今依然立脚于抒情诗般的同情之上的。这是因为它还只停留在感情上的联结上。这应该成长为物理性力量的纽带。许多人对军队的不道德的沉默表示着愤慨。朴政权认为，只要掌握了军队就会平安无事。国民则认为，那个军队不从朴政权分离出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并认为，在朴政权被推翻后，六十万的强大军队应该成为新政权的很好的同伴。这是因为他们目睹的现实是，对现代的后进国来说，哪里也不会有可以忽视军队的那种政权。我们希望，希腊、葡萄牙或泰国能够在那样的现实中走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在怀着忧虑注视着。衷心期望它将是新型的革命。因此，韩国的各种宣传报道手段也都注意报道了希腊的胜利及其所走的道路。

送走苦脑的一年的我们的心情也显得寂寞、暗淡。快

要迎接一九七五年了。衷心希望新的一年里不再有因为说了一句主张起码的民主和人权的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现象。日本的朋友在一九七四年这一年里也抱着体谅我们韩国人的痛苦心情，参加争取韩国的民主的斗争，并表示了同情，对此致以衷心的谢意。同时作为一九七四年的总结，向大家报告：韩国也接近了再不能用刀枪统治的境地，致此搁笔。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